

錢謙益遺著於清代的出版及 「典律化」歷程

嚴志雄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康熙六年(1667)夏，季振宜（滄葦，1630-1674）序刻錢謙益（牧齋，1582-1664）《錢注杜詩》，云：

丙午[1666]冬，予渡江訪虞山劍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縹緗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顧無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注杜詩也，年四五十即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牧翁閱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¹

本文初稿，分二次寫成。二〇一四年五月，筆者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出席「今古齊觀：中國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大會的論文，約爲本文上半。同年八月，承南京大學邀請，參加「越界與融合：清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遂勉力寫出本文下半。二次研討會中，蒙師友不棄，給予筆者諸多修改建議，感甚！感甚！《集刊》所聘三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了中肯的評價及修改意見，在此亦一併致謝。本文原缺「結語」，其中一位審查人的審查報告對本文的旨趣、材料之使用、整體結構有極精到之點評，筆者託《集刊》編輯徵得審查人同意，將審查意見書改寫成本文結語，特此致謝。同道切磋、論學之樂，斯之謂歟！又，《集刊》編輯王福禎先生、門人陳建銘君協助整稿，付出良多，附此致謝。

¹ [清]錢曾：〈序〉，見[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上冊，頁3。

又云：

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屋疊牀，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鷄棲牀之辰也。²

季序寫於牧齋死後三年。

牧齋《錢注杜詩》及其他遺稿是否都由錢曾（遵王，1629-1701）保管並為整理，文獻不足，不可具考。若果如振宜所言，「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其書者」，其故安在？鄒式金〈牧齋有學集序〉曾提到：「〔牧齋〕易簀時，乃以手訂《有學集》授遵王。余子漪為及門，故得見而知之。」³則《錢注杜詩》及後刊為《有學集》之書稿其時應在遵王手中。如此，則牧齋門生故舊不願過問牧齋遺稿，不欲與遵王共其事，卻是可以想像。

事緣當初牧齋新死，遵王即被捲入所謂「牧齋家難」的漩渦中，有逼死柳夫人如是的嫌疑；遵王淪為不齒於人，狗彘不如的「獸曾」。牧齋門人如歸莊、顧苓等飛書筆伐，略無假貸。此後數年間，天下痛罵「獸曾」的聲浪不歇⁴。明乎此，牧齋門生故舊不願與遵王過從、共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上述情況以外，其時牧齋之門生故舊如不欲插手處理牧齋遺稿，筆者認為，也許還有一個更值得探討的原因。牧齋未死，毀譽榮辱，一身當之，如何處理其著作，也是他個人的事。牧齋既死，其文稿固應由子孫接管料理，然牧齋子孫愛孱弱，不足以當此任。保存、刊行這位「四海宗盟五十年」（黃宗羲語）⁵、一代文豪的文學遺產，門生故舊現在的確責無旁貸了。為牧齋整理遺稿出版，茲事體大，不難想像，該如何妥善處理牧齋遺文，成為牧齋門生故舊的一個焦慮 (anxiety)。

牧齋乃明清之際文壇宗主，人無異詞，但牧齋以南明弘光朝禮部尚書之身降清仕清，淪為「貳臣」，當時不恥其為人者不少，此亦情理中事。所謂「大節有虧，其餘皆不足觀」，牧齋歿後，欲為其謀一身後名，或欲保存、流通、刊刻其「文學遺產」於世，主其事者，必須向讀者解釋，既然其人大節有損，為何還有

² 同前註，頁4。

³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雜著·附錄》，《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冊，頁953。

⁴ 可參拙作：〈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明清詩文研究》第1輯（2011年6月），頁1-28。

⁵ [清]黃宗羲：《南雷詩曆》，卷2，《黃梨洲詩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頁49。

必要閱讀其作品，以及提點讀者，該如何比較正確地理解牧齋。

復次，牧齋入清以後作品犯清諱之處甚多，更不好處理。此中是非曲直，千頭萬緒，又事涉當時名公大僚，以及明清改朝換代之事，該如何評說？該由誰來發言？難言之矣，實乃難為之事。

事實上，牧齋病革之際，曾以「歿後文字」（應就是其傳狀或墓誌銘）請託於其極欣賞之人。那是黃宗羲（梨洲，1610-1695）。梨洲晚年撰《思舊錄》，於「錢謙益」文末追憶道：

甲辰〔康熙三年，1664〕，余至，值公病革，一見即云以喪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即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唯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其子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⁶

從此看來，即便梨洲其時沒有當面打退堂鼓，拒絕牧齋之託，其心中意願不會太高，可以想見。

嗚乎！牧齋生前，為人撰墓誌銘、傳狀無算，稱一代作手⁷，然於其歿後，卻無人（至今）為作墓誌銘。梨洲先生難辭其咎，而常熟，上下五百餘年，亦無人乎？

固然，牧齋大部分遺稿最終得以出版，流傳於世。審視相關文獻，不難發現，主其事者，一直要面對、處理上述關於如何詮解牧齋的「焦慮」，即對當時後世的讀者解釋，為何還有必要閱讀牧齋的作品，以及提點讀者，該如何比較正確地理解牧齋。

在牧齋歿後出現的悼文及歷次刊行牧齋遺作的序跋文字中，漸次形成一條錢氏通往「典律化」的路徑，此一焦慮一直未曾釋放，倒似成為此等文獻的精神內核、驅動力量。本文擬對牧齋此一「典律化」歷程 (canonization processes) 作一整體、系統性的考述，以觀察、理解牧齋由明末清初走向後世的、曲折的「典律

⁶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冊，頁375。

⁷ 參裴世俊：《錢謙益古文首探》（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86-98。

化」歷程，以及牧齋的「接受史」(history of reception)⁸。

⁸ 錢仲聯在《錢牧齋全集》書前的〈出版說明〉中，對收入《全集》的牧齋詩文集的各種版本有扼要說明，《全集》書後附錄了若干舊刊本的各家序跋、校印緣起、校印例言等，本文之述論，或有所參考，或有所取材，獲益良多。迄今，對牧齋詩文集所作最詳盡之考述者，仍為周法高刊於一九七四年之長文〈錢牧齋詩文集考〉。周文以傳統版本、目錄、校勘學的治學方式，對牧齋傳世的詩文集作了精闢的述論，至今仍具不可或缺的價值。見周法高：〈錢牧齋詩文集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卷第1期（1974年12月）；後收入氏著：《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1-97。此外，蔡營源所著《錢謙益之生平與著述》第三章為〈著述考〉，對牧齋著作有頗為全面的述介。見蔡營源：《錢謙益之生平與著述》（苗栗：作者自印，1977年），頁211-254。又，柳作梅對牧齋數種重要著作，亦有專文論述。諸位前輩學者學力深湛，運用材料膽富，考論嚴謹詳明，其著述至今仍具重要參考價值，我輩研究牧齋者，不宜錯過。時賢著作，則可參陸林：〈錢謙益詩文集版本知見錄〉、〈錢謙益詩文集版本知見錄續補〉，《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387-404；鄧小軍：〈周法高編《足本錢曾牧齋詩注》書後〉，《古詩考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15-131；王紅蕾：《錢謙益藏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對瞭解牧齋詩文集現存版本的特色及度藏情況有相當的幫助。

本文所用「典律化」(canonization)一概念，或譯「經典化」，海峽兩岸翻譯，有所不同，各有側重。「文學典律化」(literary canonization)的理論及實踐背後，存在著權力、國族集體記憶、教育、意識形態、種族、身分、性別、經濟利益等諸多問題，影響重大且深遠，有不容不措意者矣，故西方學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有過激烈的辯論，眾聲喧嘩，著述紛紜，實乃一時盛事，隨後漢語學界的研究成果亦頗豐富多彩。（其實，日本教科書對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的敘述、當前臺灣關於歷史課綱「微調」及教科書的書寫策略引起的爭論，亦可置之於典律化研究的視野下考量。）至今，學者普遍認為，典律建構(canon formation)乃一複雜、流動的過程，與時俱進，本無所謂金科玉律。論者或側重探論文學作品內蘊的美學及思想價值，即所謂「典律性」(canonicity)，此中以Harold Bloom所著*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最具代表性；亦有論者強調，典律建構實與一時一地一代的「社會能量」（政權、意識形態、文教舉措、經濟結構、市場傳銷、民眾品味與消費傾向等等）及「文學制度化」(the literary institution)息息相關，互為表裏，John Guillory所著*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一書即深入分析了「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分配與典律建構的微妙相互作用。關於canon的扼要述介，可參“Canon of literature,” in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Eleventh Edition), eds. M. H. Abrams & Geoffrey Galt Harpham (Stamford, CT: Cengage Learning, 2015), pp. 43-46。童慶炳所著〈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05年9月〕，頁71-78）一文，在漢語學界曾被廣泛引用。童文指出，「文學經典建構」起碼有六個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現人」（又可稱為「贊助人」）。童氏提出的框架頗具提綱挈領之效，照顧到中國文學典律化建構過程中的內外部因素：前二項屬於文學作品內部，童氏稱之為「自律」問題；中間二項屬影響文學作品的外部因素，為「他律」問

二、「上下千載，惟昌黎與廬陵，抑震川而潛溪」——故友龔鼎孳的悼念與「蓋棺定論」

龔鼎孳（芝麓，1615-1673）〈祭虞山先生牧齋錢學士文〉開首云：

維康熙三年 [1664]，歲在甲辰，五月二十四日，皇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內翰林秘書院學士事虞山牧齋錢先生，以疾終於里第。其遺孤遺使告哀，通家後學都察院左都御史龔鼎孳發函卒讀，則先生五月十一日手書，儼然在焉。鄭重誣託，叮嚀身後之事甚具。⁹

龔氏少牧齋三十餘歲，年輩懸殊，但錢、龔二人情誼甚洽，為摯友。（文學史上，有所謂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者，即：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龔文透露，牧齋歿前十三日，曾修書致龔，「鄭重誣託，叮嚀身後之事甚具」，是牧齋臨終，欲託龔料理身後事矣。（錢函未及付郵而錢死，最後是與錢氏的訃聞一起交到龔氏手中。）二人情誼之深厚、真摯，於此一事，即可充分反映。

這篇祭文，芝麓寫來，想必煞費思量。除了致哀悼之思外，芝麓也許意識到，他可能是對牧齋作出「蓋棺定論」的第一人，要為牧齋此一備受爭議的人物找到留存在人們（及後世）記憶中的理由及價值。

芝麓首先彰顯了「文學」的永恆價值及不朽性 (the immortality of literature)：

蓋嘗曠觀天壤，賢愚同盡，鵬鷗一揆。厥有文章，獨弗侵蝕，振古如茲。¹⁰在追憶了牧齋與己的情誼後，芝麓掉筆寫牧齋的文學成就，認為以其著述，牧齋亦足以不朽矣。芝麓云：

題。童氏強調，最後兩項（讀者、發現人），處於「自律」和「他律」之間，乃內部與外部的連接者，任何文學經典的建構如缺此二項不能發生。本文論述牧齋遺著在清代的典律化過程，若依童氏之見，重點即在其所謂「讀者」與「發現人」發揮的功能及具體言說，但更精確而言，本文視野中的「讀者」，並非一般讀者，而為已扮演著「發現人」或「贊助人」角色的「行動者」(agent)。復次，本文所論，就其大者而言，或可置之於牧齋著作的「接受史」中理解，但如此一來，千頭萬緒，且難免弱化了文學典律建構理論可能給予的論述力度及解釋力度，故而本文的整體論說，主要仍循文學典律化的思維角度展開，幸讀者鑑之。關於牧齋於清代及近現代的接受史，業師孫康宜教授曾有精到論述，見 Kang-i Sun Chang, "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s.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199-218, 可參考。

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 963。

¹⁰ 同前註。

維三吳之間氣，孕千仞之鳳暉。先生爲文，海涵嶽負，靡不苞圍。或如龍掣，或如電掣，馬煩爭奇。忽焉排蹙，忽焉渟寂，弗可端倪。而其鎔經鑄史，嚴潔精微，又若法吏斷獄，國門購賞，匪一字之可移。方其覃心於考證，幽遐必闡，芻蕘必咨。苟傳聞之齟齬，雖捐千金而不悵，訪四方而弗疲。至夫恪守指歸，則上下千載，惟昌黎與廬陵，抑震川而潛溪。¹¹

芝麓對牧齋的著作給予極高的評價，充分顯揚了牧齋的「文學不朽性」(literary immortality)。芝麓將牧齋置放在「上下千載」的「文統」中考量，認爲他上可接唐、宋大家韓愈（昌黎，768-824）、歐陽修（廬陵，1007-1072）之統緒，近可與明代宗匠宋濂（潛溪，1310-1381）、歸有光（震川，1507-1571）相比肩。

芝麓繼而詠讚牧齋任事之「才」與「志」：

乃若立交戟、領清流也，競以爲三君八俊，何異乎驚驚麒麟？希風望塵之士，咸若神仙而舉爲羽儀。有震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志，而兼有收拾天下人才，挽回世道之大力與深思。其忠信篤厚，內用之於嫺黨，而外用之於師友，蓋實欲以任名教之總持。是先生以其一身，繫天下之輕重，嘗四十餘年於斯。奈何始厄於奄禍，再厄於閣訟，三厄於刊章幽狴，牢脫虎吻，擲一官而敝屣之是爲。嗟乎！以斯人而不得宰相，終老列卿，誠爲數奇。已同展禽之三黜而欲去，縱有元崇之十事其焉施？¹²

芝麓於此處雖不明白道破，但牧齋東林黨魁、「清流」領袖、「名教之總持」之身影與夫態勢呼之欲出。牧齋曾自道：「我本愛官人。」¹³牧齋爲官的遭遇卻相當可悲，仕途蹉跎，屢次掉官，其進退出處，大抵與東林黨人在朝中勢力之盛衰相爲因果¹⁴。「以斯人而不得宰相，終老列卿，誠爲數奇」，芝麓蓋憐牧齋未能躋身臺輔、決策中樞也。

崇禎改元，牧齋官至禮部侍郎，卻因爭入閣爲大學士而遭崇禎斥逐；明社既屋，仕清，清人只以其崇禎時原官起用。「已同展禽之三黜而欲去，縱有元崇之十事其焉施」云云，是芝麓感慨於牧齋懷才而莫展也。展禽，春秋時柳下惠，孟

¹¹ 同前註，頁 964。

¹² 同前註。

¹³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飲酒七首〉其五，《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7，頁 207。

¹⁴ 牧齋生平事蹟，詳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年）。下文同。

子稱之爲「聖之和者」，但任魯大夫時，曾三次被黜免¹⁵。元崇，唐代姚元崇，敢言，有「救時宰相」之譽；「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¹⁶。

牧齋於明清易鼎之際之言行最具爭議，芝麓於此，也最語焉不詳：

稽厥生平，回翔清要之地者，曾不滿三載與兩期。洎坤軸拂翻，晚年一出，蓋欲化異同而歸大冶，曷嘗以黨魁自居？而景陽鐘歇，結綺冰漸。既矢志其弗遂，爰與時而委蛇。邁興朝之景運，登耆舊於禁闈。若李邕之衣冠，望之有異，抑任昉之門庭，坐客恒依。未幾何而善病，同疏傅之拂衣。拜賜金與擁傳，羨勇退而知幾。¹⁷

甲申(1644)夏，南明弘光朝立於南京，以續明統，牧齋官拜禮部尚書，任內無多建樹（亦諸多掣肘所以然），又與權臣馬士英(1591?-1646)、阮大鍼(1587-1646)等相周旋，論者謂失其節操。翌年，清兵大舉下江南，破揚州，兵臨金陵城下，牧齋以南明禮部尚書降清、仕清，淪爲「貳臣」（十八世紀清乾隆帝所創名目），論者斥其有負於於朱明，乃不忠之臣。此牧齋一生行事之最爲人詬病者，所謂「大節有虧」是也。

芝麓於牧齋出處進退之間，隱約其事，且多恕辭、美辭，多體諒之心，固爲親者諱，爲長者諱也。祭文之作，彰善隱惡，亦理之所宜。芝麓於明清易代之際，行爲亦有類似於牧齋，甚或更不堪者。先是李自成陷北京，芝麓嘗降大順，接受「僞署」，及清人入京，芝麓又出而迎降，授給事中。則芝麓非唯「貳臣」，乃「叁臣」，三朝易幟，兩度投降。如此觀之，芝麓於牧齋的出處進退閃爍其辭，無多議評，也就不難瞭解了。

上段引文之後，芝麓接而論牧齋晚年之勇於著述，云：

乃顧以後死之身，任三百年之是非。蒐哀度閣，排攢見聞，蔡邕差慰，荀悅並追。史乘畢而《列朝》就，此豈後學之所管窺。故知者以爲欲用其未足，而不知者且滋議夫鳳德之衰。詎期蒼旻叢妒，牙籤道盡，絳雲一炬，灰劫烟飛。先生於焉冥志藝林，研精《佛首》，標新注釋，演徹宗資。然時而酒酣耳熱，發作高吟，往往在乎蒼梧之側，若水之湄。湘騷石闕，使

¹⁵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0上〈萬章章句下〉，頁315-316。

¹⁶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24〈姚崇傳〉，頁4383。

¹⁷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64。

聽之者猶足慷慨而歔歔。¹⁸

「後死之身」，倖存之人 (survivor) 也；「任三百年之是非」，其人以論次有明三百年之史爲己任。（芝麓此牧齋以「後死之身」治明史之說，實後牧齋不殉明乃爲治明史說之濫觴。）或謂順治七年 (1650) 冬絳雲樓火焚以前，牧齋已獨力撰成《明史》百卷，所編纂之《列朝詩集》已付梓人，幸免於火。芝麓「史乘畢而《列朝》就」云云，蓋指此也。絳雲一炬，萬卷成灰，江南藏書一大浩劫。佛弟子牧齋痛定思痛，發願於有生餘年，「將世間文字因緣，迴向般若」¹⁹，生前遂陸續完成多部佛經箋疏，其中尤以《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卷帙最繁浩，最耗心力，宜乎芝麓特別表出。

牧齋於史學、佛學方面的著述成績斐然，此不在話下，其於文學，其實未如芝麓所說「冥志藝林」，入清以後，猶作有大量詩文。此芝麓固知之。芝麓云：「然時而酒酣耳熱，發作高吟，往往在乎蒼梧之側，若水之湄。湘騷石闕，使聽之者猶足慷慨而歔歔。」此數語對瞭解牧齋的心事相當重要。

《山海經·海內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注：「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²⁰《史記·五帝本紀》：「〔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²¹李白〈遠別離〉云：「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²²「蒼梧之側」，舜帝葬身之處。芝麓謂牧齋發爲歌詩，「往往在乎蒼梧之側」，毋乃謂牧齋故國舊君之思未曾去懷。「若水之湄」云云，亦有典故。《呂氏春秋·適音》云：「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²³南朝陳徐陵〈陳文帝哀策文〉：「若水傳帝，熏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於陳。」

¹⁸ 同前註，頁 964-965。

¹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緣起論〉，《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第 8 冊，頁 473。

²⁰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0 〈海內南經〉，頁 90。

²¹ 〔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 〈五帝本紀〉，頁 44。

²²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3，頁 157-158。

²³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5 〈仲夏紀第五·適音〉，頁 123。

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胄，暉煥郊禋。」²⁴意者芝麓乃謂牧齋猶寄望有新王應運而生以恢復明室歟？芝麓此數語之典故一經闡明，怵目驚心，寄意可謂遙深。

芝麓於文末云：

於戲！先生之生也，名高望大，豈天之豐此而嗇彼，難免乎仕路之迍邐，與夫眾口之謦訾。先生之死也，謗焉誹焉者，固當息喙於蓋棺，而尤不能掩抑，謂其非文苑之宗師。所可深痛者，斥產蕭然，幅巾待盡，顧以弱嗣孱息，不遠燕、吳，而見託於眇知。²⁵

芝麓傷心以外，憂心忡忡。一則或已聞牧齋「家難」將臨²⁶。一則以牧齋死後屍骨未寒，而謠譌蜂起，「謂其非文苑之宗師」。

芝麓於文首以「皇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內翰林秘書院學士事虞山牧齋錢先生」稱牧齋，而以「通家後學都察院左都御史」自稱，可謂隆而重之矣。又云：「於是為位而哭，悲不自勝，且遍告同朝之與先生遊者。」²⁷或即有意借助於皇權 (imperial authority) —— 儘管現在已是清代的皇權了 —— 與牧齋在朝門生故舊之勢力以控制、化解此一危機？若然，芝麓亦可謂無愧於故人矣。

三、「哀文章之淪喪，孰能繼其高蹤」——門人歸莊的悼念與評價

牧齋歿後，曾撰祭文以致悼念之思者唯二人，故舊中乃龔鼎孳，門人中則歸莊（玄恭，1613-1673）。

牧齋與歸氏一家因緣匪淺。玄恭乃歸有光 (1507-1571) 曾孫。明清之際，牧齋推揚歸有光不遺餘力，歸之學術文章始燦然於世。至玄恭謀刻歸有光全集，乃以體例、編次之役請於牧齋。牧齋與玄恭父歸昌世（文休，1574-1645）為摯友，感情篤厚。玄恭於明亡前拜在牧齋門下，其身影屢見於牧齋晚年詩文，乃牧齋暮年一親近弟子。逮牧齋「家難」起，柳夫人自縊身亡，玄恭撩衣奮臂，聲討

²⁴ [陳] 徐陵著，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11，頁1430-1431。

²⁵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65。

²⁶ 可參拙作：〈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頁4-7。

²⁷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63。

凶手。凡此種種，均可見玄恭對牧齋情義之深長²⁸。

玄恭〈祭錢牧齋先生文〉重點有二：一述牧齋的文學成就，一論牧齋「未竟之志」。玄恭云：

嗚呼！古之所謂不朽：立德、立言與立功。故有宋一代之士，歐蘇之文章，遂與程朱之理學，韓范之勳猷，並美而比隆。百餘年來，文章之道，徑路歧而蕪穢叢。自先生起而頓闢康莊，一掃蒙茸。知與不知，皆曰先生今日之歐蘇兩文忠。先生之文，光華如日月，汗浩如江海，巍峩如華嵩。至其稱物而施，各副其意，變化出沒，不可端倪，又如生物之化工。殘膏剩馥，霑溉後學，使空空者果腹，俚俚者發蒙。文章之有先生，信八音之琴瑟笙鏞，而五采之山龍華蟲。先生於一代首推先太僕公，太僕之文，初為同時盛名者所壓而不大顯，先生極力表章，忽然雲霧廓清，白日當空。小子某，始也昧昧，及門之後，薰炙陶鎔。始知家學之當守，而痛懲夫妄庸。²⁹

春秋之世，魯大夫叔孫豹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³⁰當玄恭說：「古之所謂不朽：立德、立言與立功。故有宋一代之士，歐蘇之文章，遂與程朱之理學，韓范之勳猷，並美而比隆。」他已作了一次「概念偷換」(disguised displacement)。「言」，在原文的語境中指真知灼見之言論，所謂「嘉言」，與「立德」、「立功」在道德、事功的側重相近。在玄恭的強調中，「言」與「文學」(literature, belles lettres)之「文章」等同起來，其意實近曹丕《典論·論文》所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³¹宋代最重「文」，且不殺文臣——於「古」之後，玄恭略過漢、唐，直接從「有宋一代之士」敘起，可謂聰明。於其脈絡，「立言」（「歐蘇之文章」）與「立德」（「程朱之理學」）、「立功」（「韓范之勳猷」）鼎足而立，不分伯仲，「並美而比隆」。宋朝以後，玄恭的視野跳接到近世（晚明以降），云「百餘年

²⁸ 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67-96、395-398。

²⁹ [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70-471。

³⁰ [周]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35〈襄公二十四年〉，頁1152-1153。

³¹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52，頁720。

來，文章之道，徑路歧而蕪穢叢」，陷入混亂與危機。在玄恭看來，牧齋乃有明一代「文章之道」撥亂反正的大功臣：「自先生起而顛闢康莊，一掃蒙茸。知與不知，皆曰先生今日之歐蘇兩文忠。」於此之後，玄恭遂大肆稱頌牧齋文事上之卓越成就，無忝「不朽之盛事」。與芝麓一樣，玄恭是在「文道」、「文統」的譜系與發展上，找到牧齋不能磨滅的價值與成就——芝麓將牧齋與韓愈、歐陽修相提並論，玄恭稱美牧齋為今日之歐陽修、蘇軾，為唐宋八大家之後之一大家、「典範性宗師」(a canonical master)。

與芝麓一樣，玄恭接而論牧齋之「才」、「志」、「遇」，其言云：

先生通籍五十餘年，而立朝無幾時，信蛾眉之見嫉，亦時會之不逢。抱濟世之略，而纖毫不得展；懷無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³²

又云：

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費志以終。人誰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嗚呼！我獨悲其遇之窮。³³

此中，固以「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數語最引人注目。牧齋「中道之委蛇」，所指者何？玄恭並未明白揭出，但大概亦不出於南明弘光朝之與弄臣周旋，及後以禮部尚書之身降清仕清之事。而牧齋「思欲以晚蓋」，當指牧齋晚年「自我救贖」(self-redemption)的種種舉措，欲以改變其不忠於明室的形象以及身後史家對己之評議（「身後名」）。（「晚蓋」，謂以後善掩前惡也，《國語·晉語一》：「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³⁴讀者急欲知道的是，牧齋是通過「言」（詩文的渲染力量）抑或「行」（實際的政治行動）來施展其「晚蓋」的作業？於此一端，關乎吾人如何瞭解牧齋晚年詩文的本質，以及牧齋之人格操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惜乎玄恭於此卻三緘其口，比芝麓更語焉不詳。固然，此中種種情實，不能深責玄恭，要他和盤托出。首先，此為祭文，故人新喪，並非議論亡者道德操守之時之地。況且，讀玄恭文至末段，知其時牧齋「家難」已作——內云：「小子之初拜夫靈筵也，頗聞將廢匍匐之誼，而有意於興戎。」——保住牧齋此際的聲名以期化解錢家此番劫難才是要緊事³⁵。

³² 歸莊：《歸莊集》，頁471。

³³ 同前註。

³⁴ 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晉語一第七〉，頁265。

³⁵ 可參拙著：〈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頁4-7。

明乎此，則「哀文章之淪喪，孰能繼其高蹤」³⁶乃玄恭此文傾力之所在也就不難瞭解了。都說「顧怪歸奇」（說的是崑山顧炎武和歸玄恭），耿介絕俗，玄恭實乃識大體知分寸，眷念「通家」、師生情分者，牧齋九泉之下可以告慰。

四、牧齋入清以後詩文首度結集出版及鄒式金之牧齋《有學集》序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門人瞿式耜於明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刻行；牧齋《有學集》，收其入清以後所作詩文，凡五十卷，牧齋生前未及刊布³⁷。一九二〇年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曾影印出版鄒鎡序刻本，此為傳世《有學集》早期版本之一種（此本應非鄒本之初刻本，乃論者所謂之「後來改本」）³⁸。鄒鎡序後署「康熙甲辰陽月」，而究其實，「鄒鎡」其人及所署年月不無可疑之處，錢仲聯編纂《錢牧齋全集》，於此即有所考辨，云：「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的本子，前有鄒鎡序文，該序用的是鄒式金文，而刪改了若干字句，甲寅改為甲辰（康熙三年），署陽月（十月），離錢謙益逝世纔五個月，序稱錢謙益易簣時以手訂《有學集》授錢曾，舊時版刻極費時日，豈有僅短短五個月內即刻成此巨帙之理。式金改稱為鎡，梁溪改稱范陽，書中很多剗改缺漏之處。這一版本，是極壞之本……。」³⁹錢說入情入理，似可從。今以《有學集》初刻於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距牧齋逝世後十年。

鄒式金〈牧齋有學集序〉云：

《傳》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人三合為一，今仁義道喪，事勳希微，獨有立言耳。而言亦難矣。剽竊之儒，繩規而矩步，得其象貌，失其精神。跼蹐之士，恃聰而騁明，始乎離奇，終乎淺陋。兩者交譏，遞相勝負，而莫知所主。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牧齋先生產於明末，乃集大成。其為詩也，擷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並草堂之雄而

³⁶ 歸莊：《歸莊集》，頁471。

³⁷ 牧齋為所謂明清「兩載人」，其《初學》、《有學》二書亦平分秋色，真妙。

³⁸ 說見錢仲聯〈牧齋有學集序〉校記，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53。

³⁹ 說見錢仲聯：〈出版說明〉，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第1冊，出版說明頁5。

不師其貌，間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鑪錘，北地爲之降心，湘江爲之失色矣。其爲文也，仰觀雲霞之變，俯察山川之奇，中究人物品類之盛，本之六經以立其識，參之三史以練其才，遊之八大家以通其氣，極之諸子百氏、稗官小說以窮其用。文不一篇，篇不一局，如化工之肖物，縱橫變化而不出乎宗，又如景星卿雲，光怪陸離，世所希見，而不自知其所至。信藝苑之宗工，詞林之絕品也。

近世論文者，率云寧爲眞布帛，勿爲僞綺羅。然才短則氣局不雄，境僻則章施不爛，若富有日新，從心不踰矩，不得不以此事相推矣！先生目下十行，老而好學。每手一編，終日不倦。尤留心於明史，博詢旁稽，纂成一百卷，惜燬於絳雲一炬，豈天喪斯文耶？或所論之人，爲造物忌而靳之耶？抑如龍門是非有謬於聖而不欲傳之耶？

幸《初學集》已經付梓，得留人間。晚年名益高，望益重，頽然應酬，亦自病其濫觴。易簀時，乃以手訂《有學集》授遵王。余子漪爲及門，故得見而知之。合之，而先生之文盡，千古之文亦盡於此。

或有以字句過求先生者，世祖嘗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大哉王言，聖朝不以文字錮人久矣。學者覽先生之文，即當諒先生之志。縱或訾先生之人，不能不服先生之文。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康熙甲寅 [1674] 陽月梁溪後學鄒式金序。⁴⁰

此爲牧齋歿後，其遺作首次得以刊行流通，茲事體大⁴¹。

式金序最特別之處，在於亟寫牧齋之「文學不朽性」，幾乎全不敘寫其道德品行及政治行爲。式金文始終就「立言」亦可以「不朽」一義做文章，其篇首布局類於龔鼎孳、歸莊祭文，但特別強調，去古已遙，於今之世，求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者不可得，退而求其次，苟其人能以「立言」成就其「不朽」，已屬難能可貴，並言「而言亦難矣」，不可小覷，有其高度的要求與準繩。此一論述策略，雖非爲「立言」爭取獨立於道德、事功以外的、理想化的自足主體性 (subjectivity)，但無疑大大提高了「文學」於明清易代之世的重要性與地位，彰顯了它的時代意義。較諸龔、歸，式金論牧齋於「立言」之特徵與成就更爲具體，指出牧齋「產於明末，乃集大成」，此於牧齋作品瞻博之面貌可謂

⁴⁰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 952-953。

⁴¹ 固然，此前牧齋之《錢注杜詩》於康熙六年已先問世，惟《錢注杜詩》係牧齋箋註杜詩之學術著作，與《有學集》爲牧齋個人詩文，性質上不同。

得之；接而就「其爲詩也」與「其爲文也」二端鬯論牧齋詩文獨到之處，無愧古人，勝於今人，自成一大家，「信藝苑之宗工，詞林之絕品也」。

此外，式金可能意識到，他還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始能讓牧齋成於清初的作品流通於世。要之，牧齋《有學集》詩文的一大特色與夫感染力量，正在於其強烈的故明之思與「仇滿」色彩，此與筆者於他處論述過的「明遺民詩學」(poetics of Ming loyalism)或「遺民體詩」之語言及思想、情緒有所交集⁴²。此等故國舊君之思、悖逆新朝之詞，何可再容其傳播於今大清聖朝之世？況且，式金序中透露，曾的確「或有以字句過求先生者」。於此，式金相當高明，他選擇不作任何辯解（這會越描越黑），而是直接祭出「皇權」，說：「世祖〔順治帝〕嘗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式金接而忙不迭地歌功頌德，說：「大哉王言，聖朝不以文字錮人久矣。」於此一敘事策略 (narrative strategy) 中，與其說式金是在衷心讚美清主聖明，不如說他是在「挪用」(appropriate) 順治皇帝的話語，以期堵絕「文字獄」興起的可能。（式金說「聖朝不以文字錮人久矣」，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前此不久，即有所謂「明史案」，順治十八年 [1661] 案發，康熙二年 [1663] 秋定讞，慘酷異常，手起刀落間，七十餘人頭滾地。）⁴³於此之後，式金接言：「學者覽先生之文，即當諒先生之志。縱或訾先生之人，不能不服先生之文。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如此這般，給予讀者一個印象，即，即便是大清順治皇帝，亦能體諒「先生之志」，吾等蟻民，自然亦當如是。究其實，這是一個誠懇的請求——讀者諸君，請勿「因人廢言」，牧齋之行事固可訾，但其「文學」，的確爲「盛事」，可以「不朽」。竊以爲，當時讀者，爲感動於後者爲多。

又十年餘，時爲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1685)，無錫金匱山房刊刻「訂定」本《有學集》，計五十一卷。此本保留原來鄒序本之編排次序，而於各卷中分別補入原刻所未收之佚文逸詩，又因題跋、雜文增補不少，故另編一卷，附原本後。此本有〈金匱山房訂定牧齋先生有學集偶述十則〉，點評牧齋文事，不及其餘，其述論之大端如：「先生留心史事，其詩文皆史也」；「先生覃精經學，如序刻《十七史》，而曰先經後史」；「集中文多微辭，詩尤有隱語」；「先生論明

⁴² 可參拙著：《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55。

⁴³ 關於此案，可參白亞仁 (Allan Barr)：〈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清史論叢》2010年號，頁49-85。

文，前祖宋文憲，後宗歸太僕」；「逃禪是先生末路，作宗門文字，幾當是集之什三」；「先生兼通二教，博極群書，故用字多奇僻，後生淺學，有未詳者」；「諸題跋文，崢嶸蕭瑟，言短味長」等等⁴⁴。

總之，自一六七四年鄒序本《有學集》初刻，至一六八五年前後金匱山房「訂定」翻刻，牧齋所遺詩文沒有引起文字風波或遭朝廷查禁。從鄒序至此〈偶述〉，主事者可謂成功地將對牧齋的評論控制 (maintain) 在「文苑」、「文事」之內——將「政治」(politics) 盡量摒諸門外——彰顯了牧齋的「文學不朽性」，同時實現了為其詩文從手抄本 (manuscripts) 轉變為刊本，使其從私人領域 (private sphere) 進入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以雕版印刷的形式流通於世。牧齋之書於是傳焉，諸子亦可謂用心良苦矣！

五、言與行糾葛的重現——凌鳳翔所作錢遵王牧齋詩註二序文

在十八世紀乾隆帝於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對牧齋著作展開禁燬、堵絕之前，還有兩種重要的牧齋詩版本得以問世，是為錢遵王之《牧齋初學集詩注》、《牧齋有學集詩注》。遵王牧齋詩註初稿成於順治十七年 (1660) 至康熙二年 (1663) 間，牧齋於康熙三年逝世前得見。此二種詩註，牧齋歿後數十多年間，遵王仍不斷增益補訂，約於康熙三十一年 (1692)、三十二年 (1693) 間定稿。遵王歿於康熙四十年 (1701)，在其有生之年，其牧齋詩註並未刊行於世。逮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前後，有朱素培者攜遵王詩註入粵，邂逅苕南凌鳳翔（生卒年不詳），鳳翔讀之，心折其奧博，遂為之校訂刻行⁴⁵。遵王為牧齋詩之功臣，鳳翔為遵王牧齋詩註之功臣，吾人當心存感激。

鳳翔為遵王牧齋詩註先後撰有二序。其〈牧齋初學集詩注序〉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論述牧齋對文壇的貢獻與意義：

竊惟宗伯詩適當詩派中衰之際，實開熙朝風氣之先。余蓋嘗綜唐以後自五代歷宋、元、明詩派而論之，五代承唐末溫、李餘習，至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梅諸公力起而振之，多學杜、韓，蘇子

⁴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 967-969。

⁴⁵ 參卿朝暉：〈錢曾《牧齋初學集詩注》再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第 1 期（總第 84 期），頁 98；卿朝暉：〈前言〉，錢謙益著，錢曾箋注，卿朝暉輯校：《牧齋初學集詩注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1-3。

美、王介甫亦學之，漸返之雅健。神宗時，蘇、黃、晁、張諸公，別開江西詩派，是為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為大宗，又繼之以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專攻晚唐五言，益卑不足道。金初以蔡〔松〕年、吳激為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為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以好問為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為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傑，以高啓為之冠。成、弘間，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間，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號雲間體，蓋詩派至此衰微矣！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⁴⁶

鳳翔於此，可謂作了一種「文學史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的工作，將牧齋放置於唐代至清代「詩派」(groups and schools of poetry)的發展史中考量，以彰顯其特殊的意義與貢獻。於此脈絡中，牧齋一方面被視為一具有普遍價值(universal value)的文學領袖，一方面又於明末清初詩學嬗遞中有其特殊、相對的意義(particular and relative value)。可以說，這是首見對牧齋所作的、相當徹底的、「去政治化」的(depolicitize)處理，在一定程度上，為其在中國文學史上謀得一應有席位。鳳翔對此中文學史現象的構築與評議是否正確，其說可從與否，自然有討論的空間，但無論如何，鳳翔的論述方式於清代牧齋評論中是比較罕見，且就某一意義而言，已展現出一種具有某種現代意義的、學術的思辨進路與處理方法，確乎難能可貴。

至於牧齋足以稱為一「典範性詩人」，鳳翔亦有此一說：

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保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排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⁴⁷

竊以為，鳳翔對牧齋詩特色的描畫（除了「大雅元音」云云）無疑是相當精到。

⁴⁶ 同前註，附錄，頁1219。

⁴⁷ 同前註，頁1219-1220。

再者，鳳翔認為牧齋對清代詩歌的繁盛有重要的貢獻：

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予何敢私之篋衍，爰付之梓，以公同好，庶與昔人所稱三奇注并垂天壤間，且使今之作者，咸知自宋至今，詩派相傳，至昭代而極盛者，由牧齋宗伯實開風氣之先而集其成也。此亦予表揚詩學正宗之本懷云爾。⁴⁸

「實開熙朝風氣之先」云云，文中二見，可見鳳翔對此說之重視。「熙朝」，於此語境，自是指皇清。牧齋為明清「兩截人」，其屬明屬清、如何給予適當評價，因為事涉明清二朝的「政治正統性」(political legitimacy)問題，清初以降，一直是件棘手的事。若然能將牧齋「收編」於皇清之統，對清之學者而言，發言、議論就方便多了（牧齋樂意與否，是另一回事）。此鳳翔亟亟以牧齋為清詩「開風氣之先者」、「詩學正宗」之深意歟？若然，亦可謂苦心孤詣矣！

不過，話說回來，鳳翔於校訂遵王牧齋詩注時，也作了些令人髮指的事：

宗伯詩博大精深，固足開風氣之先，而非斯注，亦誰與發明之哉？余年來篝燈校讐，釐正魚豕，間有傷時者，輒其三四首，至〈秋興〉十三和詩，直可追踪少陵，而傷時滋甚，亦并輒之，蓋其慎也。⁴⁹

就原始文獻遭受破壞一事言，我們固然痛心疾首，但平情而論，鳳翔此舉亦無可厚非，其刪詩的目的，是為將清廷查禁或文字獄案發生的風險降低，使遵王之牧齋詩註「適於付版」(fit to print)。鳳翔刪去之詩（及遵王註），乃牧齋「傷時」之作，也就是帶有政治色彩、犯「聖諱」、清諱之作。讀過牧齋《投筆集》〈後秋興〉組詩的讀者都知道，牧齋此百餘詩充滿排滿、仇滿、寄望反清復明的情緒與思想，一字一驚心，宜乎鳳翔當時「慎之」，不敢刊行；事實上，《投筆集》一直要到清亡前數年（光緒、宣統年間）方有刊本⁵⁰。由此觀之，上述鳳翔論牧齋全就其於文學史上之價值與意義著眼，不涉牧齋於明清易鼎之際之行事、

⁴⁸ 同前註，頁 1220。

⁴⁹ 同前註。

⁵⁰ 可參拙著：《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pp. 77-146。本文審查人認為，凌氏於序中強調者，乃牧齋於明末崛起而取代明前後七子之「典範性」地位，凌氏刪詩之舉，乃因若干牧齋作品，違背了「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排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的體式情韻。若從詩學內部審視之，此說固不無道理。然而，詳味凌氏「間有傷時者，輒其三四首，至〈秋興〉十三和詩，直可追踪少陵，而傷時滋甚，亦并輒之」云云，似乎凌氏所考慮者，及此「傷時」之為義，還在於牧齋詩中的政治敏感內容，多於其詩之雅正與否。

操守，也許不無避開政治敏感性話題及危險的考量。

鳳翔此序，敘論、思慮可謂已相當周詳。不意鳳翔竟有遵王牧齋詩註第二序，是爲〈牧齋有學集詩注序〉，其言曰：

錢遵王注其牧齋宗伯《初學集》詩二十卷，予爲序而版行之。既復卒業其《有學集詩注》而再序之如左。

余惟宗伯先生以文章通顯，歷神、熹、思三朝，名重天下。會熹廟時巨璫竊柄，摧陷正人，先生削籍歸里。及思皇登極，召起田間，未及柄用，旋復放歸。已而權姦下石，身幽囹圄，以垂白之老，苟延殘喘，甘受桎梏之辱而不辭者，以曾在史局，撰《神宗實錄》，身任一代文獻之重，未藏名山而傳諸其人，如司馬子長所云，則一死所繫，豈等鴻毛哉！

翔生後時，不獲見其所著史，今即就其詩而論。自天啓甲子後迄於本朝初年，有詩如千篇，時賢共稱其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采苓〉懷美人，〈風雨〉思君子，其憫時憂世，三致意焉，宜其可傳也夫！

當冀北龍去蒼梧之日，以及江東駿遊黃竹之年，石馬晨嘶，金鳧夜出，一二遺老，類皆沉淪竄伏，毫遜於荒。其他凋謝磨滅，墓木已拱，而文采弗彰，可勝道哉！可勝惜哉！

先生獨傷心捫淚，奮其筆舌，含垢忍恥，輒復苟活。既師契而匠心，不代斲以傷手。俾後之覽者，如登臺以望雲物，上巢車而撫戰塵，莫不耳目張皇，心胸開拓。顧其時際滄桑，有難察察言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爲之詮解而闡幽發潛，亦孰知宗伯之詩，可以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其關係重大有若此也哉！河東子有言：每思報國，惟以文章。此宗伯先生志也。故并序而梓之，以公同好云。苕南後學凌鳳翔謹序。⁵¹

鳳翔此序與前序迥異。前序專就牧齋之文事立論，不涉其他，此序則於明清之際的歷史脈絡中亟論牧齋之志節。鳳翔憫其人，哀其遇，矜其心，此略同於上述龔鼎孳、歸莊之祭牧齋文，但鳳翔此序還有一個「論旨」(argument)，即，牧齋多次應死、可死，而不死，乃爲留其有用之身，思以文章報國——依其所見，牧齋於明季數朝屢遭屈辱，其所以不死，乃因「曾在史局」，「身任一代文獻之重」，故而忍辱負重，苟延殘喘；逮明社既屋，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牧齋不以

⁵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53-954。

身殉明，乃因其時其他文章作手墓木已拱，或沉淪竄伏，牧齋遂「獨傷心捫淚，奮其筆舌，含垢忍恥，輒復苟活」。鳳翔復循此指出，牧齋詩「憫時憂世」、「可以備漢三史，作唐一經」，乃有「重大關係」者。

鳳翔略跡原心，其意固善，惜其所論甚陋。牧齋於晚明、明清之際之經歷複雜曲折，而牧齋性格本多矛盾，決非「聖人」、「完人」，其於生死進退之抉擇，爲己爲他，原委難測，迄今無定論。鳳翔此「牧齋不死乃因身繫一代文獻之重」之論，過度簡約 (oversimplified)、武斷，有欠周詳。

尤有進者，鳳翔真不識大體者。此其賣弄文筆之地乎？此序刊於遵王註牧齋《有學集》詩書首，其說出，衆目昭彰，集矢之的，在鳳翔？在牧齋？在遵王？鳳翔此序，真可謂把禁錮的魔鬼都釋放出來了 (set the devils free)。

六、沈德潛置牧齋於「國朝」詩人之首，引發軒然大波

沈德潛（歸愚，1673-1769）《國朝詩別裁集》（又有《欽定國朝詩別裁集》之目，今稱《清詩別裁集》），始選於乾隆十九年 (1754)，二十四年 (1759) 初刻，二十五年 (1760) 重訂，二十六年 (1761) 增訂本刻成，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命南書房刪改重鑄，將錢謙益等人之詩刪去。

歸愚此選，收入清初以迄乾隆間詩人近千，詩作幾近四千首，亦鴻篇鉅製矣，歸愚以《國朝詩》名其集，固欲使之成爲清朝之「正典」(canon)。

歸愚原書領銜者，即牧齋，其牧齋小傳云：

錢謙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萬曆庚戌，賜進士第三人。國朝官至禮部尚書。著《初學》、《有學》二集。

尚書天資過人，學殖鴻博。論詩稱揚樂天、東坡、放翁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揮斥之；餘如二袁、鍾、譚，在不足比數之列。一時帖耳推服，百年以後，流風餘韻，猶足聳人也。生平著述，大約輕經籍而重內典，棄正史而取稗官，金銀銅鐵，不妨合爲一爐。至六十以後，頽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幾謂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謂漸減唐風，貶之太甚，均非公論。茲錄其推激氣節，感慨興亡，多有關風教者，餘靡曼嚙殺之音略焉。見《初學》、《有學》二集中，有焯然可傳者也。至前爲黨魁，後逃禪悅，讀其詩者應共悲之。

牧齋詩，如「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屋如韓愈詩中句，

身似王維畫裏人」，工致有餘，易開淺薄，非正聲也。五言平直少蘊，故不錄。⁵²

對牧齋之才、學，及其於明清詩壇的貢獻，歸愚頂禮有加，云：「一時帖耳推服，百年以後，流風餘韻，猶足響人也。」又云：「向尊之者，幾謂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謂漸減唐風，貶之太甚，均非公論。」可謂持平之論。至謂牧齋「前爲黨魁，後逃禪悅，讀其詩者應共悲之」云云，亦平恕之言。歸愚以牧齋詩有「靡曼嚙殺之音」，或若干詩句「工致有餘，易開淺薄，非正聲」，又或「五言平直少蘊」等等，大有參考價值，可存一說。歸愚於所選牧齋詩後，間附己評，亦可作牧齋詩的「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看。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增訂本《國朝詩別裁集》刻成。同年十月，歸愚赴京爲太后祝壽，將《國朝詩別裁集》呈獻於乾隆帝，求御覽，乞序。乾隆閱後，不滿於歸愚選入錢謙益、錢名世(1660-1730)詩，又以其稱愼郡王（胤禧，1711-1758）之名等大不妥，下令內廷翰林刪改，重付鐫刻⁵³。

南書房改訂本即《欽定國朝詩別裁集》，前附乾隆〈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云：

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繫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爲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

⁵² [清]沈德潛選編，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卷1，頁1。

⁵³ 沈德潛編：《沈歸愚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1冊，影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頁61a-63a，「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條。本文審查人指出，沈德潛置牧齋於「國朝」詩人之首而引發軒然大波，應該更在其錄錢氏「推激氣節，感慨興亡」之作，令清高宗也無法坐視不理。此誠卓識。無論如何，乾隆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諭中曾言：「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求爲題辭，披閱卷首，即冠以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足論？即以詩言，任其選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爲開代詩人之首！」見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上〉，總頁251。由此看來，設若沈德潛有《明詩別裁集》之選，書末錄牧齋詩，乾隆即便見之，也可能不與計較，不會興如《清詩別裁集》之大案。

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謙益諸人爲忠乎？爲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爲，德潛不及細檢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朕方爲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爲之序！又錢名世者，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慎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豈宜直書其名？至於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內廷翰林爲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潛也，所以終從德潛之請而爲之序也。⁵⁴

沈歸愚，「江南老名士」、「尙書房行走」，致仕前官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爲乾隆親近之臣，乾隆曾賜詩，有句曰：「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初。從來稱晚達，差未負耽書。」⁵⁵沈老進獻《國朝詩別裁集》，求御序，本爲成就聖朝及己一樁風雅之事，沒想到，此舉竟爲自己及牧齋帶來滅頂之災。姑勿論歸愚所選之牧齋詩及其評論是否妥當，若然此番「國朝詩」之事成，又獲仁聖天子賜序，其書流布天下，則牧齋之「身後名」在某一意義上就得以「平反」，牧齋之書料亦可以繼續流通於世，進入清朝「文統」、「文苑」，成爲「典範性」的詩人。不意此事竟引出乾隆帝對牧齋（及歸愚）之「斧鉞之誅」，牧齋「典律化」之作業，亦功虧一簣。歷史的偶然性真出人意表，莫測其首尾之所在⁵⁶。

七、十八世紀清高宗乾隆帝對錢謙益的「斧鉞之誅」

細檢《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五十四年（1789）之二十八年間，共有十九件文獻（或乾隆下諭，或批奏）直接與乾隆帝

⁵⁴ [清]清高宗御製，[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卷12，頁9b-11a。

⁵⁵ 清高宗御製，[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初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2-1311冊），卷34，頁23b。

⁵⁶ 此中情實，也許還有必要從另一角度考量之，此乃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之另一會議席間，徐雁平、羅時進二位教授提點者。要言之，究竟是因爲乾隆要批判牧齋而牽連及沈德潛，還是因爲乾隆要奪其時天下之「文柄」（在沈老手中），必先整沈而後方可？牧齋乃此事「冷手」中之「熱煎堆」，遂借力打人？此一「陰謀論」，實在發人深省，惜筆者對沈德潛與乾隆二人之間的關係尚無深入研究，不敢臆斷，請俟他日。

批斥牧齋其人或查燬牧齋著作有關，論者較常援引的是轉述於《貳臣傳·錢謙益傳》的一道諭令⁵⁷。該諭實乃乾隆評議牧齋的第一道專諭，時為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六日，乾隆嗣後批評牧齋的基本理據、思辨模式、修辭特色於此諭已告奠定，茲錄其最關鍵一段文字如下：

諭曰：「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臚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為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為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為明朝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為可鄙可恥！……」⁵⁸

要之，在乾隆眼中，牧齋乃一「有才無行之人」，原因是：前明時牧齋位列高官，卻於明清易幟之際率先投降，不旋踵復仕清，於大節有虧，仁人君子所不恥者也。尤有進者，牧齋既仕清，為食祿之臣，猶於其著作中「筆墨騰謗」，詆毀我朝，其所圖者無他，「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總之，牧齋此人卑鄙無恥，其言虛偽，傷道害德，其著作必須銷燬，勿令流傳。

筆者在他處已比較詳細地探討過，除上述的道德批判(moral judgment)及禁燬誹謗清朝、犯清諱的書籍(或曰「文字獄」)的情況外，在乾隆持續批判牧齋的近三十年中，牧齋的厄運還須與其時乾隆施行的種種政教舉措一併考量，此中包括：給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彙輯《四庫全書》，編纂明季《貳臣傳》，編製國初以來滿漢大臣表傳，建構「滿洲」身分及主體性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乾隆自命天下聖王及歷史、文化「大判官」的心態，其欲締構一種忠貞不貳的臣節觀，其暗中與牧齋較勁爭高下等心理因素，亦不容忽視⁵⁹。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參看拙著，茲不贅。下文則欲疏理乾隆批斥牧齋的數段文字，用以窺探乾隆查禁牧齋的舉措，如何反而彰顯了牧齋身後的「不朽」，以及透露了牧齋書籍於十八

⁵⁷ 可參張小李：〈乾隆帝批判錢謙益的過程、動因及影響〉，《故宮學刊》（北京：故宮博物院）2013年第1期，頁150-163。張文資訊，承本文審查人提供，謹此致謝。

⁵⁸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9〈貳臣傳·錢謙益〉，頁6577-6578；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836〈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上〉，總頁155a-b。

⁵⁹ 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pp. 59-76.

世紀的、實際的流通情況。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六日諭有云：

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為銷燬。著各該督撫等，將《初學》、《有學》二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彙齊送京。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者，並著廣為出示，明切曉諭，定限二年之內，俾令盡行繳出，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該督撫等，即將全板儘數查出，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實為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所有各書坊，及藏書之家，原無干礙。各督撫務須詳悉諭知，並嚴飭屬員，安靜妥辦，毋任胥役人等，藉端滋擾。若士民等因此查辦，反以其書為寶，不行舉出，百計收藏者，則其人自取罪戾，該督撫亦不可姑息，若將來犯出，惟該督撫是問。⁶⁰

同月二十五日諭有云：

此等詩集〔按：指錢氏《初學》、《有學》二集〕流傳，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因降旨宣諭中外，令該督撫等，將書板及刻本，悉力查繳，送京銷燬。今偶閱其面頁，所刻《初學集》，則有「本府藏板」字樣，《有學集》，則有「金匱山房訂正」，及「金閭書林敬白」字樣。是《初學集》書板，原係伊家所藏，縱其後裔凋零，而其書現在印行，其板自無殘缺，轉售收存，諒不出江蘇地面，無難蹤跡跟尋。至《有學集》，則鑄自蘇州書肆，自更易於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書賈等轉視為奇貨，乘間私行刷印密藏，希圖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晉此時現駐蘇城，著傳諭令其將二書原板，即速查出，檢點封固，委員迅行解京。若所屬或有翻刻之板，亦令一併查繳，毋任片簡遺留。至前諭查銷刻本，予限二年，原因邊遠省分，及窮鄉僻壤，一時或難周徧，是以寬定其期，俾不致失於疎漏。若江南地居近省，且係錢謙益原籍所在，尤應首先查繳。倘時日過於稽延，恐無知之輩，罔識利害，竟將應燬之書，得以從容潛匿，則因循之貽誤不淺。雖此等藐法之人，犯出原可重治其罪，然與其嚴懲於事後，何如妥辦於此時？高晉奉到此旨，務即實力查辦，不得僅以委之屬員塞責。若

⁶⁰ 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36〈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上〉，總頁 155b-156a。

不留心身親其事，以致有名無實，日後一有發覺，惟該督是問。⁶¹

閱二月，逮八月二十九日，乾隆又諭軍機大臣等曰：

據永德奏稱，淮江省起獲王辰尊書鋪玉詔堂《初學》、《有學集》板片，係嘉興諸在林書鋪賣給，其板係勞姓自廣東帶來。隨傳訊諸在林。供稱：此板係伊夥石門縣人勞武曾往粵賣書，因廣東刻匠價賤，將帶去《初學》、《有學集》各一部，在廣照依原本翻刻帶回，轉賣與王辰尊。勞武曾已於三十二年[1767]八月在廣病故等語。錢謙益《初學》、《有學》二集，前經降旨通諭各督撫，查辦追繳。今據永德查奏，諸在林、勞武曾將原本在廣東照依翻刻，雖其板已帶回轉賣，但廣東既有翻刻之事，安知此外更無另刻板片，刷印流傳？著傳諭李侍堯、鍾音於該省書坊，明白曉諭，切實詳查。如有翻刻板片，及印就書本，即速追出，解京銷燬，仍照江省之例，量加賞給，無使書賈等慮及耗捐貲本，轉致隱匿存留。該督等務飭屬員實力妥辦，仍行據實奏聞。⁶²

乾隆皇帝日理萬機，仍對查禁牧齋詩文集一事「咬定青山不放鬆」，屢發諭旨，委任辦案人員，製定步驟、細節、時間表，自本年六月至年底，一共頒下六道諭令（四下專諭，二次批奏），像得了「強迫症」一樣，可見其「錢謙益情結 (complex)」之深且重。觀其六月二十五日諭，知其時乾隆看到的是崇禎末初刻本《初學集》及康熙二十四年(1685)無錫金匱山房「訂定」本《有學集》，是所謂無註本。此搜查諭令頒下不久，就有重要收穫。乾隆於八月二十九日之諭中透露，浙江巡撫覺羅永德（?-1772；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任浙江巡撫）⁶³於蘇州起獲王辰尊書鋪所藏《初學集》、《有學集》書板。此事之來龍去脈甚有趣，且牧齋詩文集於乾隆帝下令禁燬前夕的實際流通情況，此諭也無意中提供了若干訊息。

此中所謂「玉詔堂板」實際上是一「盜版」(a pirated edition)。「玉詔堂板」牧齋集，本為錢曾箋注之《牧齋初學集詩注》及《牧齋有學集詩注》（與上述的「無註本」系統不同，只收牧齋之詩及錢曾詩註），約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前後問世（詳上文）。王氏遭查獲之書板乃係購自浙江嘉興諸在林書鋪者。蘇州離嘉興不算遠，江、浙二地商賈交易買賣，本亦尋常。最妙的是，諸氏

⁶¹ 同前註，卷 837〈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下〉，總頁 179a-180a。

⁶² 同前註，卷 841〈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下〉，總頁 239a。

⁶³ 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1619-1620。

之書板乃遠在廣東據原書「影刻」而來。先是諸氏與勞武曾自嘉興赴廣東賣書，攜去者包括玉詔堂板《初學》、《有學》詩註各一部。諸、勞二人入粵後，以廣東「刻匠價賤」，遂照原書雕板一副帶回嘉興，其後倒賣給蘇州王辰尊。

綜上所述，可知牧齋詩文集有讀者基礎。江南書賈遠赴嶺南賣書，會帶去牧齋集，固然有把握得售，不然江南嶺南，山長水遠，誰會幹這傻事？再者，諸、勞二人願意在廣東斥資「翻板」，並將衆多書板長途跋涉攜歸江南，牧齋書物在江南更暢銷，思過半矣。諸氏最後又將書板倒賣予王氏，可見在江南地區中，江蘇地區讀者之好牧齋書又超過浙江嘉興者。

下令禁燬牧齋書籍之後四年，乾隆接獲一份匯報，藉之，可得知牧齋之書約有多少已「落網」。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軍機處上諭檔中有「大學士舒赫德等奏將各省解到《初學集》等書及板片銷燬摺」，云：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奏：

查從前奉旨，諭令各省將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等書，解京銷燬。前經臣等將解到各書，奏交內務府燒燬。續據各省解到《初學集》等書，共二萬三十一本，又未釘者四十部。理合奏明，仍交內務府銷燬。再，查有解到《初學集》等書板片，共二千九十八塊，應交武英殿收查。其中或有尚可劇用者，作為刊刻別項書籍之用，其殘損澆薄者，即行燒燬。謹奏。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旨：知道了。欽此。⁶⁴

綜上所述，牧齋歿後十年，其遺著《有學集》得以板行於世，又五十年，錢曾之牧齋詩註二集亦告梓行。牧齋歿後九十餘年，一代詩老沈德潛編纂《國朝詩別裁集》，以牧齋之傳及詩冠書首。至乾隆帝於一七六九年下詔禁燬牧齋，距牧齋之逝，已百又五年，其時牧齋之書仍活躍流通於國中，讀者好之。至一七七三年年底，已有二萬餘本牧齋之書遭查獲並銷燬，在劫難逃者，尙有近三千塊書板，數量相當可觀。凡此種種，足可證明，牧齋的著作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可傳，且膾炙人口，堪稱「經典」而無愧。在乾隆朝禁燬牧齋書籍以後，作為「典範性詩人」的牧齋又多了一新屬性——牧齋是一位「被查禁的作家」(a censored writer)，在其「典律化」的過程中，曾遭受皇權與「國家機器」無情的鉗制與摧

⁶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92。另可參沈津：〈錢謙益的《初學集》、《有學集》〉，《書叢老蠹魚》（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25-133。

殘，但這卻反而微妙地坐實、成就了他的「不朽性」。乾隆帝不厭其煩的銷燬諭令及其無所不用其極的查禁手段（以及其滿漢大臣積極的回應）對牧齋的書籍來說，固然是一場災難，但也在無意中——用最確實的方式——向世人（以及後世）宣告：牧齋是一位有著獨特魅力與持久影響力的作家，不然，大清乾隆皇帝怎會在牧齋歿後一世紀餘讀其詩文猶大動肝火，必鞭其屍燒其書而後始快於心？不難想見，牧齋的著作對瞭解明清之際歷史、政治、士人之遭遇與心態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價值。復次，經清廷如此一禁，牧齋之書物對讀者而言，又別有一番風味了，所謂「雪夜閉門讀禁書」是也。這對探究牧齋於後世的「接受史」而言，又增加了一個必須考量的面向。

八、清末章炳麟「攘斥滿洲」思想脈絡中之錢謙益論

章炳麟（太炎，1868-1936），浙江餘姚人，清末重要思想家、革命家、學者。《疍書》為章氏首部自選文集，初刊於一九〇〇年。一九〇四年《疍書》重訂本出版，其時距清朝之覆亡，六、七載而已。章炳麟論牧齋之文字，學者於相關研究多有引用，以之為牧齋在十八世紀遭清乾隆皇帝禁燬後最重要的「平反」言論，有重要意義。章氏之論牧齋，見其〈別錄甲·楊顏錢〉一文，《疍書》初刊本無之，見於一九〇四年《疍書》重訂本，故其成於一九〇〇—一九〇四年之間亦可知。學者已指出，《疍書》初刊本引起的反響並不大，數年之後的《疍書》重訂本在思想及組織上有重大變化，出版後即「轟動海內」，其書反映出章氏已從「改良主義」(reformism) 轉向擁抱「革命激進主義」(radicalis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章氏割髮易服，矢志革命，反清。（在《疍書》二篇〈別錄〉後，章氏即以〈解辮髮〉一文收束全書。）⁶⁵

必須指出，我讀章氏文，發現章氏其實並不那麼欣賞牧齋，但牧齋在其種族革命、夷夏之辨、排滿復漢的思想及呼籲中有可用之處，故論及之耳。

章氏〈別錄甲·楊顏錢〉一文只有二千字左右，卻是大文章，論的主要是揚雄 (53 B.C.-18 A.D.)、顏之推 (531-591)、錢謙益，古今之事二姓而於史有名者

⁶⁵ 章炳麟著，朱維鈺編校：《疍書（初刻本）（重訂本）》（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朱維鈺〈導言〉、〈本冊說明〉，頁1-41。章炳麟文詞古奧，艱澀難懂，故本節所論，參考了章炳麟著，徐復注：《疍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為免文繁，不一一出註。

（用乾隆創造的語詞來說，即「貳臣」）。文首云：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睹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鷄鳴」。易代小變，猶慍淒不忍視，況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著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間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於文辭者，故所在而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於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⁶⁶

此章氏全文論旨之大較：易代變革，即便是「易姓」而「中夏」無恙，士大夫睠懷故國，多有情不自禁，「悲憤發於文辭者」，設若「挈圻甸而傳之異族」，亡國於異族，其淒涼感慨之意，溢於言表，更不難瞭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章氏論揚雄、顏之推、錢謙益，整體而言，展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略其跡而原其心，認為此三氏雖均有事新主之舉，但其種族、故國之念實未曾去懷，人格、精神有可取之處。章氏於本文的立場與論旨，實與其排滿、排清的思想息息相關。嘗試論之。

西漢成帝時，揚雄任給事黃門郎。王莽篡漢，國號新，揚雄為大夫，嘗作〈劇秦美新〉以獻，後人多詬病之。章氏則認為，揚雄獻〈劇秦美新〉，以「外示符命」為幌子，「內實以亡秦相風切」⁶⁷，有深意在焉。要之，揚雄「究觀莽變法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為光武、明、章導師，所以盪亡秦之毒螫者，至後漢始效」⁶⁸，以此，揚雄溢美之言實為一「諷刺」(mockery)。復次，章氏以為，揚雄乃身在魏闕而心存漢室者，故其有「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之語⁶⁹。在章氏看來，揚雄以此「明其命胙〔案：指漢祚〕方半，將中興，復舊物」⁷⁰。「愀夫！其辭之志微樵頓也」⁷¹，章氏同情揚雄，提醒讀者，其辭隱微，其心憂戚，要須深惟之。

顏之推原籍琅邪臨沂（在山東），世居建康（今南京），早歲得梁湘東王賞

⁶⁶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煇書（初刻本）（重訂本）》，頁339。

⁶⁷ 同前註，頁340。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漢〕揚雄著，汪榮寶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20〈孝至〉，頁562。

⁷⁰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煇書（初刻本）（重訂本）》，頁340。

⁷¹ 同前註。

識，年未及冠，被任爲國左常侍。及周師破江陵，顏氏「志不欲事仇國」，投奔北齊，歷廿載，官至黃門侍郎。西元五七七年，齊爲周所滅，顏被徵爲御史上士。西元五八一年，隋代北周，又於隋文帝開皇年間被召爲學士，故顏嘗歎曰「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⁷²、「三爲亡國之人」⁷³。

章氏論顏氏，特表出其在齊時一事，以見其心跡於一斑，云：

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⁷⁴

後周師侵齊，陷晉陽，章氏復推測顏氏於去就之際的考慮，云：

之推以陳氏因國於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勢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顗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⁷⁵

顏氏先後事梁、齊、周、隋數朝，章氏引顧炎武(1613-1682)「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之語論之，體諒之言也。章氏述顏氏於去就之際，有「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的深思，一方面表彰顏氏不忘故主，另一方面又表出顏氏的思想中，有一種超然於對一姓一朝忠貞，但內裏又相對統一的準則與規範在。也許可以稱之爲以「江左」、「神州」、「舊族」等元素爲其構體的「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章氏述顏氏在齊，「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亦近此意，蓋「思魯」者，寄懷舊鄉瑯琊也，而「敏楚」，「敏」通「愍」、「愍」，傷梁國之亡也。章氏又述顏氏訓子一事。有人謂教子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可討好、服事公卿。顏氏大不以爲然，勉其子曰：「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此中除了對士人風骨的強調外，尚有與上述「文化中心主

⁷² 語出顏之推〈觀我生賦〉，〔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卷45〈文苑傳·顏之推〉，頁625。

⁷³ 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見同前註。

⁷⁴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煇書（初刻本）（重訂本）》，頁341。

⁷⁵ 同前註。

義」相關的「華夷之辨」在起著作用。

章氏接而論錢牧齋，云：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尚書。

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詘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最樸嫻。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己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恚也。

鄭成功嘗從受學，既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己當席藁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間，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

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

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⁷⁶

細味其文，章氏對牧齋的人格操守並不恭維，指牧齋爲一「徇名而死權利」之人，持論相當狠辣。至如論者多以牧齋傾力排斥明代復古派，有廓清摧陷之功，章氏雖不否定牧齋的貢獻，但對牧齋本人的文字，卻謂「然其體最樸嫻」。「樸嫻」，猶言疏闊、瀟灑，貶詞。在章氏筆下，牧齋可足稱道者，唯有其晚年所作《投筆集》之〈後秋興〉百餘首詩，因其中充滿「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之情思，乃牧齋寄望明室中興（及後失望）之什，亦其「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的懺悔 (confession) 及自我救贖⁷⁷。究其實，章氏之稱道牧齋，乃其「排滿主義」的投射，內裏且有一種「種族主義」(racism) 的底蘊。

上文已述及，牧齋因有如章氏所謂「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的文字

⁷⁶ 同前註，頁 341-342。

⁷⁷ 本文審查人指出，歷代讀者對牧齋之評價，不必然盡對同樣之作品、作品集而發，章氏此處之意見，乃針對牧齋之《投筆集》而言者。然而，愚見以爲，章氏《塢書》對牧齋的整體評議，實遠超過於《投筆集》的範圍，而涉及牧齋於明清之際之政治行爲、人格操守、對滿清政權的反覆態度。明乎此，則吾人尤須於章氏「攘斥滿洲」之思想脈絡中理解其對牧齋之評價，唯其如此，方得其實。

而遭滿清乾隆皇帝痛斥與查禁，謂其「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差」，實則「食盡其言，偽不實」。章氏則辨牧齋之語言文字不盡「詭偽」——「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偽矣」。章氏於此雖聊聊數語，但對牧齋於清末民初的「接受史」影響甚大，蓋章氏之論有助於重建牧齋文字之「誠」(sincerity)，並稱許其「仇滿」、「晚悔」的作為，遂開重新評價牧齋之進路(inroad)（相對於乾隆對牧齋之「定論」而言），道德批判的天秤於焉傾側。

於論牧齋一段後，章氏再舉清初毛奇齡(1623-1776)為例，以之對比牧齋之事蹟。毛奇齡，明末諸生，早歲參與抗清軍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時薦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章氏論之曰：「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旃裘。」⁷⁸章氏眼中，牧齋雖仕清為「貳臣」，思以「晚蓋」，良心未泯，毛奇齡則晚節不保，令人扼腕慨嘆。章氏接而述清初至乾隆中葉士大夫之馴化、奴化於清主，云：

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為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藻等，雖仕滿洲為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為共主，意至狠款。其佗或為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娖，猶明於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嬖嬰，變風絕矣。⁷⁹

觀章氏「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嬖嬰，變風絕矣」云云，知本文之論揚、顏、錢，以及清初至清中葉之士節，大有借古喻今之意。此後，章氏即大書特書士節、易代、亡國之大義，以喚醒世人：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荏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於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尚矣哉！

墨子曰：「買鬻，易也；霄（即消）盡，蕩也。」（〈經說上〉。）同族迭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⁸⁰

於揚、錢、顏三氏中，章氏對揚雄的評價最高，稱許其清靜，不慕榮利，心懷故漢。章氏始終對牧齋軟弱的性格（「荏染」）頗有微詞，但牧齋雖迷途，最後猶覺今是而昨非，還是得到了章氏的讚許。在章氏筆下，顏之推處境艱難，但不忘

⁷⁸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煢書（初刻本）（重訂本）》，頁342。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同前註，頁343。

故國故主，且能以「中國」爲其選擇去就的準則，實在難能可貴。總之，牧齋、顏之推都是「知類」（種族、民族）的「江左士人」，於此一端，章氏讚賞不置。

在章氏看來，朝代更替，有兩種情況，而士人之事二主，其悲哀亦有程度之別。「同族迭主謂之『易』」，而「異族入主謂之『蕩』」。章氏爲鄒容《革命軍》撰序亦云：「……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⁸¹章氏之說，固同意於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所謂「亡國亡天下」之辨。顧氏云：「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⁸²又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⁸³章氏於上引末云「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也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家家戶戶有責的意思。章氏之論，結穴在其「攘斥滿洲」的思想與訴求中，其於文中論及牧齋，亦正在牧齋於《投筆集》中有仇滿排滿，復興明室的思想與情緒，可資其革清之命的論述。

九、於清末，尋找、搶救牧齋

牧齋著作，乾隆皇帝打爲「毒草」，其在清末，卻人以爲寶。

牧齋遺著，有數種於清末得以刊行，如《吾炙集》（1907）、《投筆集》（1910）、《牧齋全集》（1910）（詳下）。

《牧齋全集》出版前數年間，讀者對牧齋遺籍渴求甚殷，爭相搶購，其實際情況，可於下述數則「書志」窺見一二。

《國粹學報》一九〇八年第四十五期刊〈錢蒙叟歷朝詩集序〉一文，後錄「北平朱天民」按語，云：

數年來三見是集，皆無序文，蓋爲人所刪去，惟此本尚完好無缺，殊可喜也。序文自云託始於丙戌〔順治三年，永曆元年（1646）〕，徹簡於己丑〔順治六年，永曆四年（1649）〕，時北都定鼎已六七年。牧齋既身入本

⁸¹ 轉引自章炳麟著，徐復注：《癸書詳注》，頁907，註1。

⁸² 〔清〕顧炎武：〈正始〉，《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17，頁379。

⁸³ 同前註。

朝，復謬託於淵明甲子之例，於國號紀年，均削而不書，爲他日開文字之獄，加一重罪案，皆咎由自取。至自述丁字之義，則曰：「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蓋是時南明君臣，猶擁眾於嶺越間，江浙義民，與海上之師，互爲響應。故牧齋自附於孤臣逸老，想望中興，以表其故國舊君之思，與世所傳《投筆集》同一首施兩端之見，真一錢不直也！序後所鈐印章曰「鴻朗錢齡」、「白頭蒙叟」。鴻，大也。朗，明也。錢齡，即長壽。命意尤爲顯然。讀其序，文特哀麗。推牧齋之心，蓋猶知惻怛返本者，惜其不能前死，乃欲致歎孟陽，以遺山野史自文，求諒於後世。嗚乎！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北平朱天民識。⁸⁴

此中所謂之《歷朝詩集》即傳世之《列朝詩集》。朱氏論牧齋其人，雖不脫乾隆批錢之舊窠臼，但仍不掩其對牧齋文詞欣賞之色，至謂「推牧齋之心，蓋猶知惻怛返本者，惜其不能前死，乃欲致歎孟陽，以遺山野史自文，求諒於後世」云云，批判之餘，亦不無惋惜之意。

《國粹學報》一九〇九年第四十九期刊鄧實（秋枚，1877-1951）編錄〈國學保存會藏書志〉，其於〈《錢箋杜詩元本》〉（二十卷，錢謙益箋注，何義門、俞犀月二先生評點，順德鄧氏藏書）一則云：

是本照《草堂全集箋注》，卷首附以唱酬題詠一卷、諸家詩話一卷、附錄一卷、畧例一卷、錢氏自序一首、季滄葦序一首。今錄二序如左。予所見此本，皆無錢序，或有其上頁而無其署名之下頁，蓋禁燬時爲藏者懼禍所毀去，今此本獨幸僅存，完善無缺，可寶也。書中有硃、墨、藍三色評點，卷一首頁有小字二行，曰「此硃筆何義門先生評，墨筆俞犀月先生評，苓薌錄」二十字。苓薌不詳何人，其小楷頗精，自首至末不苟。蓋此本爲苓薌所手錄，何、俞二氏之評語，散于書眉及行間者。何氏之評于錢氏每多駁〔正，謂〕〈洗兵馬〉、〈收京〉諸作，錢氏以爲「無非譏刺」爲傷教害義。然予讀錢氏箋，其獨識博引，實有過人者。錢氏生當鼎革，慨然念亂，與工部丁天寶之難，傷心兵火，同抱幽憂，故時有借題發揮，抒其憤懣之處，其〈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固無愧所謂「鑿開鴻濛，手洗日月」者。工部之得稱爲詩史，爲其憂時刺譏，推見至隱，畢陳于詩耳。若如義門之說，所謂詩史者何邪？錢氏著作如《初

⁸⁴ 見《國粹學報》第45期（1908年9月），撰錄頁1b-2a。此朱天民乃曾編民初《學生》雜誌者乎？待考。

學》、《有學》、《列朝詩集》、《箋杜詩》等，自禁燬後，存者甚僅，近年日本人復盡收購以去，故其值奇昂。余得此本于蘇城，費至十二金，猶稱廉也。⁸⁵

朱天民云：「數年來三見是集〔《列朝詩集》〕，皆無序文，蓋爲人所刪去，惟此本尚完好無缺，殊可喜也。」鄧實云：「予所見此本〔《錢註杜詩》〕，皆無錢序，或有其上頁而無其署名之下頁，蓋禁燬時爲藏者懼禍所毀去。」可見乾隆禁燬牧齋書籍之苛烈，即便偶有漏網之魚，亦多無完膚之體，蓋藏書之家冒險匿藏，難免謹小慎微，至少撕毀印有牧齋姓名字號之書頁，以掩人耳目也⁸⁶。清末愛書之士求得完帙，其欣喜之情，自不在話下。鄧氏又云：「錢氏著作如《初學》、《有學》、《列朝詩集》、《箋杜詩》等，自禁燬後，存者甚僅，近年日本人復盡收購以去，故其值奇昂。余得此本于蘇城，費至十二金，猶稱廉也。」物以罕爲貴，不足爲奇。牧齋書於清末有價，除了因稀見外，卻還因日人高價競爭搶購。此則爲新鮮事，亦反映出牧齋有「海外市場」，東瀛文士寶愛其書⁸⁷。

《國粹學報》一九〇九年第五十四期又刊鄧實〈國學保存會藏書志〉，所述者爲錢曾牧齋《初學集箋註》、《有學集箋註》（順德鄧氏藏書），云：

牧齋《初學》、《有學集》，當時禁燬最烈，故幾至隻字無存，偶有一二，亦當時士夫愛其書者，百計隱秘，藏之山巖屋壁。近今文網疎闊，始稍稍有出者，而日本人又貯鉅金在蘇門收羅，每一部出，即收購以去。余託書賈物色，將近十年，今迺獲之。印刷至精，紙墨如新，並無殘闕。蓋此書自經禁燬，藏者惟恐不密，未數經人繙閱也。牧齋著作，余於前歲既得《投筆集》、《吾炙集》及《錢箋杜詩》，近又印行《錢鈔校李義山集》，惟所缺者，錢氏所選《列朝詩集》，及其文集尺牘，至今未得，心常怦怦。世有藏者，如能割愛以歸余，固不惜兼金以相酬耳。⁸⁸

鄧氏於清末訪求牧齋遺書甚力，是真愛牧齋之著述者。記中但云牧齋《初學》、《有學》二集，觀其題目及文後附錄凌鳳翔〈有學集詩註序〉，知其所得，應爲錢曾《牧齋初學集詩注》及《牧齋有學集詩注》二種。牧齋《初學》、《有學》

⁸⁵ 同前註，第49期（1909年1月），藏書志頁1a-b。俞瑒（1644-1694），字犀月，號旅農，長洲人，入清不仕，清初杜詩學家。義門，何焯（1661-1722）號。

⁸⁶ 年來筆者有緣目驗公私藏明清之際詩人之遺集，亦多有此種情況，爲之扼腕慨歎。

⁸⁷ 據筆者所知，實則韓國文士亦盡力搜購，越南文士有無同樣舉動，則待考。

⁸⁸ 《國粹學報》第54期（1909年6月），藏書志頁1a。

集無註本，出版年代較為久遠（刊於崇禎末、康熙初），購求不易，可以理解，錢曾《牧齋初學集詩注》及《牧齋有學集詩注》約於十八世紀初刊行，且前後有二種版本，至清末，鄧氏多方蒐求，竟歷十載始入手，思之惘然，乾隆於明清之際詩人遺書破壞之鉅，可以想見，天厭之。而是時國中牧齋書又遭一新劫（或為良好的機遇？）：「日本人又貯鉅金在蘇門收羅，每一部出，即收購以去。」乾隆眼中之「毒草」，今為「國寶」矣，思之不禁莞爾。鄧氏當年，不禁憂心如焚，甚至刊出「個人廣告」(personal ad) 兼金求書，云：「牧齋著作，余於前歲既得《投筆集》、《吾炙集》及《錢箋杜詩》，近又印行《錢鈔校李義山集》，惟所缺者，錢氏所選《列朝詩集》，及其文集尺牘，至今未得，心常怵怵。世有藏者，如能割愛以歸余，固不惜兼金以相酬耳。」鄧氏真有心人。清末牧齋書之流向，留於國中，抑或遠航至日本、南北亞、歐美，實一頗可研味的課題⁸⁹。

《國粹學報》一九一〇年第六十五期又刊鄧實〈國學保存會藏書志〉一則，此記最妙，蓋其書為日本貞享二年刊本《楞嚴經疏解蒙鈔》（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順德鄧氏藏書）。鄧氏云：

《楞嚴蒙鈔》原本，為泰和蕭孟昉唱刻于武林報恩院，時則順治十五六年[1658-1659]也。此本為日本貞享年間重刊。卷尾有字三行，曰：「天和癸亥臘朔以降，泊貞享甲子十月廿五日。加倭訓，改魚魯畢。乞上報佛祖恩，下豁眾生眼而已。雖下大谷後學寓光隆沙彌知空。」又有字曰：「貞享二乙丑初春吉旦，西村九郎右衛門開板。」考日本天和三年癸亥，當康熙二十二年[1683]，貞享元年甲子，當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知當時佛教之盛，蒙叟名重三島，原書刊行不及二十餘年，即已流傳海外，為之翻板。今中土傳本日罕，即此日本版，亦越二百載，僅而復得流傳于中國，亦可珍矣！每卷之首末，皆有呼井窟朱文印，知為日本書庫舊藏。余得于杭州，和裝綿紙，完善無破損，攷蒙叟尚有《華嚴經註》、《心經蒙鈔》二書，安得合而得盡讀之乎？（《心經蒙鈔》，友人余同伯已為開雕。

⁸⁹ 筆者留學美東耶魯大學時，於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東亞圖書閱覽室見一「蒙塵」已久（在書架最底部）之牧齋《列朝詩集》初刻（為一完好本），為之撫卷不忍釋手久之。畢業前夕，曾告洋人館員，此集宜以善本珍藏（同時告渠，館藏《大藏經》已遭蟲咬，請速往救護之），館員唯唯應諾，後事如何，我已離校，不知矣！期間亦曾赴哈佛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各館，訪求牧齋書舊刻，所在多有，保管良好，調閱不至於太困難，而年來於大陸地區訪書、借讀時，屢蒙挫折、刁難，或開「天價」，始俾複印若干頁。哀哉！各館主事先生女士，能不愧然？

《楞嚴蒙鈔》蘇州有新刊本，惟《華嚴經注》聞常熟有人珍藏其鈔本者，未得見也。）⁹⁰

《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牧翁晚年耗費幾近十載心血始撰成，卷帙繁浩，流通量本來有限。此書亦在乾隆禁燬之列，可謂我佛一劫矣。牧齋《楞嚴蒙鈔》中國舊刻有順治十七年(1660)泰和蕭孟昉等刊本，光緒十五年(1889)，復有蘇城瑪瑙經房重刊本。鄧氏撰此書誌時，瑪瑙經房重刊本問世不久，鄧氏慨歎「今中土傳本日罕」，固指順治舊刻，非瑪瑙經房本也。《楞嚴蒙鈔》初刻出版後不久，即流傳日本，有貞享二年(1685)京都西村九郎右衛門刊本，後又有《卍續藏經》本（刊於1905-1912年間）。牧齋疏解佛經之書，中土東瀛，各有二刻，時代亦相若，此佛弟子心心相印乎？亦一殊勝因緣。清末鄧氏於杭州購得《楞嚴蒙鈔》日本舊刻，其時鄧氏正與日人爭奪牧齋遺籍，收得此書，欣喜之餘，難免興世事滄桑、古今書籍聚散無常之感⁹¹。

十、清帝國覆亡前夕，出版牧齋

一九〇七——一九一〇數年間，有數種牧齋遺著得以出版。

《國粹學報》一九〇九年第四十五期刊鄧實〈紹介遺書・舊著新刊類〉，所述介者為牧齋《吾炙集》，乃葉石君、馮定遠合校柳南草堂本，光緒丁未(1907)南鍼草堂新刊。本文先刊牧齋原序，後低一格附錄古今各家題識，對牧齋是書之流傳、內容多所考辨。《吾炙集》乃牧齋生前未刻（亦惹麻煩）之書，牧齋歿後，不同稿鈔本存世，各本內容稍有出入⁹²。南鍼草堂此新刊本，謂訪求得存世諸鈔，詳加校勘而復完原書舊觀，此亦一書林佳話也。南鍼識語錄如下，以見其成書經過：

牧翁《吾炙集》不分卷數，采詩凡二十一家。丁未[1907]秋，余以柳南王氏（應奎，字東澍）鈔藏本轉錄一通，與徐劍心前輩共讀之。沈鬱悲

⁹⁰ 《國粹學報》第65期（1910年4月），藏書志頁2b-3a。

⁹¹ 《楞嚴蒙鈔》，牧齋手稿一部十冊，現存世僅五，且「四分五裂」，二冊貯中國國家圖書館，一冊藏上海圖書館，另一冊度藏於美國柏克萊大學東方圖書館書庫。近年有民間所藏一冊流入文物拍賣市場，拍出二四五萬元人民幣高價。牧齋書物，於今有價矣。此稿本，何時得延津劍合，復完舊觀，吾人合什以待，至禱，至禱。

⁹² 可看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69-382。

涼，謂此中熱淚可掬，未嘗不有餘哀焉。其爲之蒐集考證，知當日所采，並不止此。惜其原帙之不可復覩也。以語丁君丙衡，丙衡則出許有介詩一小冊以贈。展視之，亦柳南故物，詩即《吾炙集》中所采，丹黃滿帙，燦然可玩。末有牧翁題詩、柳南識語各一，則皆集所未載。蓋柳南既鈔二十一家之本，又見馮定遠（班，號鈍吟）手錄許詩，點閱出自牧翁，因復鈔臨之，而別爲一本者。余喜甚，亟取題詩、識語補錄集尾，而以圈點還之許詩，且校其字句之小異者，以爲今日得見牧翁手蹟，雖零鉛賸粉，彌可寶矣！既將攜之海上，付手民，復從李丈敬與假得一本互勘之，亦二十一家，編次先後，微有不同。而錢後人曾至東海何雲二十家之後，有錢興國（字孝標，有《□雲集》，見柳南《海虞詩苑》）一跋，云是葉石君（樹廉，洞庭人，鑒藏家也）照牧翁原本所鈔臨，勘閱亦仍其舊，跋後乃接錄許詩，明非鈔自葉本而別出之。余不禁喟然歎曰：「得此而二十一家，皆復舊觀矣！」意者此實牧翁定本，葉氏得其二十家，馮氏得其一；而葉本圈點，玩「鈔臨」、「仍舊」二語，知興國時亦必有之，殆又爲後人轉鈔所略歟？然編次勘閱，則固信而可據也，遂又以葉本校二十家，仍錄錢跋于何雲詩後。集中凡柳南所校注者，亦並見焉。《吾炙》當時禁網密，故秘而未刊，又其書無卷次條貫，人各件系之，編采時爲人傳寫去者，不能無先後詳略。故柳南所見毛本，則闕西江半衲，亦有闕許有介者，今合觀葉、馮二本，則陳迹宛然，闕者固非，而漁洋、梅仙、鄮山、庭表諸詩，爲牧翁始取而終舍之，劍心之論，不亦較然無疑乎？嗟夫！二百餘年破碎沈霾之物，至今而猶見延津之合，豈非大奇。校畢，亟告劍心、丙衡，皆謂余言不謬，爲之狂喜。南禘識。⁹³

牧齋《吾炙》一集，究其實，並非至關要緊之書，乃其纂集同代友儕、後輩之詩選，類皆其所賞識、所賞玩者。清末南禘草堂主人張繼良有緣得見各舊鈔，乃爲相互校勘，拾遺補缺，最終復完原帙「二十一家」之舊觀，可謂初步解決了一樁學術公案（因前此各舊鈔所收詩人之數量不一，學人於此現象及其背後之寓意，頗有議論）。

⁹³ 《國粹學報》第45期，紹介遺書頁2b-3a。張繼良（1871-？），字南陔、南禘，號蘭思、南禘居士，常熟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進士，翁同龢門生，任刑部主事，山西河津縣知事。入民國，歷任江蘇省公署秘書、河南督理軍務署顧問，一九三八年任臨時政府司法委員會秘書。著有《南陔詞草》，輯有《佚叢甲集》、《瓶廬詩補遺》。

也許張氏對復完《吾炙集》原貌如此之熱情，並為刊行於世，無非是出於其對古籍、牧齋，以及鄉邦文獻的愛惜，但張氏為《吾炙集》所做的工作，卻在無意中反映出清末民初牧齋其人其書接受史中一個新的趨勢，即，學者開始就牧齋的遺著展開學術性的探究，而非如前代之執著於議論牧齋的人格操守及事蹟。

一九一〇年，牧齋諷議清王朝最烈、故國舊君之思表露無遺之詩集《投筆集》（含七律一百又八首）刊行於世，一大奇書於是傳焉。史家陳寅恪於《柳如是別傳》中謂「《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其重要性可以想見⁹⁴。是書排印出版，乃鄧實風雨樓假虞山龐氏所藏舊鈔本印行者。書後附沈曾植(1850-1922)〈投筆集跋〉，錄如後：

蒙叟《投筆集》二，凡詩一百八首。題為〈後秋興〉，用杜韻者，十三疊一百四首。自題前後四首。前二疊國姓攻金陵時作，後七疊皆為永明王〔按：即桂王，南明永曆帝〕作。中間三四五疊，作於國姓兵敗後。情詞隱約，似身在事中者。其書晚出，流佈市井，士大夫不樂觀，疑近人偽造。然以選詞用事察之，誠是叟筆，非他人所能為也。

明季固多奇女子。沈雲英、畢著，武烈久著聞於世。黔有丁國祥，皖有黃夫人，浙海有阮姑娘。其事其人，皆卓犖可傳。而黃、阮皆與柳如是通聲氣。蒙叟通海，蓋若柳主之者，異哉！黃夫人見《廣陽雜記》，余別有考。阮姑娘見《劫灰錄》，云甲午正月，張名振兵至京口，參將阮姑娘歿於陣。此第三疊「娘子繡旗營壘倒」，注云：「張定西謂阮姑娘：吾當使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殞，惜哉！」京口、舟山，歿地不同，當以詩為得實。阮之官為參將，正與沈雲英官遊擊同。其稱曰姑娘，蓋女子未嫁者，亦與沈、畢同。張定西與蕩湖伯阮進合兵，姑娘其阮家屬歟？

詩又云：「破除服珥裝羅漢。」注云：「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又云：「將軍鐵騎鼓音達。」注云：「乙未八月，神武血戰死崇明城下。」考徐氏《小腆紀年》，順治癸巳三月，明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破京口，截長江，駐崇明。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以眾來依。甲午正月，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祭孝陵，敗於崇明。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戰死。詩注「神武」

⁹⁴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冊，頁1169。

即「仁武」音譌。當時以姚、劉歸張，壯張軍勢，而姚軍藉柳如是橐資以成，如是所經營，不可謂小。定西欲令阮姑娘侍之，宜也。嘉興沈曾植跋。⁹⁵

沈曾植於清末民初，無論於學、於書、於詩，均卓然爲一大家，乃滿清遺老中之錚錚佼佼者。《投筆集》一書，牧齋生前未付梓行世，錢曾《有學集》詩註本之編刻者亦「慎不敢鈔」，至清季世，鈔本始流出。其書既晚出，學者於此集詩是否真出自牧齋手筆，不無置疑。沈氏之言論，有助確認《投筆集》爲牧齋作品。（其實，若依愚見，《投筆集》有錢曾詩註存世就是最好的證據，否則，連錢曾的詩註也是偽造？）

沈氏之議論，最堪注意者有三。一者，沈氏提點，牧齋諸〈後秋興〉組詩應置放於鄭成功反清復明軍事行動及南明歷史、政治的脈絡中考論，並謂其中數疊詩「情詞隱約，似身在事中者」，反映出牧齋可能親身參與了鄭成功的復明運動。再者，沈氏文中對柳夫人如是渲染的篇幅遠超牧齋。沈氏之意，固在強調「明季固多奇女子」，南明抗清活動與「女英雄」的關係不應於史無聞。與此密切相關者，則沈氏認爲「蒙叟通海，蓋若柳主之者」、「姚軍藉柳如是橐資以成，如是所經營，不可謂小」，評估了柳如是於抗清復明運動中的貢獻。復次，沈氏指出，相關史事，諸記互有牴觸，若以詩求證、考之以詩，則可得以解決；沈氏於此運用者，乃「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法。

總而言之，沈氏此跋，篇幅雖不長（其說可從與否，亦可先置之不論），然後來現代學者對牧齋於復明運動中可能扮演角色的探論、詮解牧齋詩文的進路、對柳如是女英雄形象的渲染及柳氏對牧齋行事之影響的強調，與沈氏於此文之意見及「靈視」(vision) 若合符契（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固爲陳寅恪成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柳如是別傳》）。以此言之，沈氏先聲之功，不可掩也。

同在一九一〇年，牧齋近世最重要之書問世，是爲《牧齋全集》，爲一「整理本」，乃吳江薛鳳昌(1876-1943?1944?) 遼漢齋爲排印出版者。薛氏〈校印牧齋全集緣起〉錄如後：

蒙叟爲一代文宗，與梅村、芝麓相伯仲，而蒙叟其尤也。著述宏富，流傳海內，幾於家置一編。至於今，吾人神往目想而不覩其集者久矣。蓋板銷於禁網，書亡於繳燬，江左士夫之家，所存亦僅。數十年來，京、津

⁹⁵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附錄》，頁955-956。

書估，日本行商，四出蒐求，不惜懸巨金以待。一書偶出，輒爲若輩挾之去，而所存乃益如星鳳。不惟《初學》、《有學》兩集不可得，即求其遵王箋注《初學》、《有學集》之詩，亦不可得；不惟其詩之原槧本不可見，即求其翻槧本，亦不易致。如余之無力，而能一旦盡得之，以慰數十年之飢渴，不可謂非意外之幸矣。去歲冬[1910]，遇一書賈，以鈔本之《投筆集》及《有學集補遺》二冊求售，閱之，楷字整潔，紙墨古舊，固一完好之未刻本也。亟購歸，以示里中諸同志，爭相傳閱，嘆爲未有，余亦頗自矜貴。然而《初學》、《有學》兩集，猶未見也。嗣過里中范氏書齋，獲見遵王箋注蒙叟詩之原槧本，喜不自勝，把玩不忍去。范君曰：「此猶非其全也。」乃啓舊篋，出《初學》、《有學》兩集數十巨冊以示。展而閱之，當時各家之藏書圖記，纍纍卷首，益形踳錯。范君曰：「吾曾祖嗜書，此在爾時，已出巨金以得者。而至今珍秘，不輕示人。若以君得之鈔本合之，斯兩美矣。」諸同志胥聽其言，且慫恿印行，以公同好。范君慨然允，余亦樂爲贊成，出而付印，數月畢事。吾知世之愛蒙叟之文，恨未一觀如余者，至此可大慰其飢渴矣，乃於竣工之日，特書其緣起如此。至蒙叟之詩文，先輩早有定評，又何俟余之喋喋爲？宣統二年[1910]，歲次庚戌五月，吳江鳳昌氏識於邃漢齋。⁹⁶

其書〈校印例言〉如下：

是書計《初學集》一百十卷，《有學集》五十卷，《有學集補遺》二卷，《投筆集》一卷，都爲一百六十三卷，蒙叟詩文盡於是矣，故以全集名之。

《初學》、《有學集》之詩，自以遵王箋注本爲善，蓋不獨詳其典實，而當時之朝章國故備焉。是刻悉依原本，而詩則加以遵王之箋注，較之原本，卷帙溢出不少。

原本之詩，與箋注本略有出入，詞句亦互有異同（《有學集》爲多）。茲特兩相對勘，或爲原本有而箋注本所無者，或箋注本有而原本所無者，概行增入，以蕪完備，並加按語，俾易區別。至詞句之同異，則主原本，而以箋注本列注中。

舊鈔本之《有學集補遺》，係何義門先生舊藏，朱墨燦然，並有圖記。間

⁹⁶ 同前註，頁974-975。

有與正集重出者，茲特刪去，俾免重複。

《投筆集》之名，不見於正集，僅見於遵王箋注本之目中。遵王箋注《有學集》詩目，《投筆集》編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慎不敢鈔」四字。至翻槧本則以下二卷之《東澗集》分爲三卷，不列其目，當時止有鈔本也可知。茲特取舊鈔本附諸卷末，以爲全璧。校印者識。⁹⁷

清帝國在夕照中苟延殘喘，命祚不久矣。人們看書，百無禁忌。

清道光以降，文網鬆弛，風氣漸開，各種禁書一一浮現。牧齋在晚清重現時，身影瀟灑多了。人們已不再汲汲於考辨其生平事蹟，或議論其心之誠僞邪正，牧齋一代宗師的地位似已毋庸置疑⁹⁸。

薛鳳昌〈校印牧齋全集緣起〉開篇即云：「蒙叟爲一代文宗，與梅村、芝麓相伯仲，而蒙叟其尤也。著述宏富，流傳海內，幾於家置一編。」於文末又云：「蒙叟之詩文，先輩早有定評，又何俟余之喋喋爲。」可見清末讀者已普遍視牧齋爲一典範性大家，瓣香私淑者不乏其人。薛氏卻又感歎：「至於今，吾人神往目想而不覩其集者久矣。」何以故？薛氏指出，其時牧齋書罕見，讀者渴求，主要有二原因：一者「板銷於禁網，書亡於繳燬」，一者「數十年來，京、津書估，日本行商，四出蒐求，不惜懸巨金以待。一書偶出，輒爲若輩挾之去，而所存乃益如星鳳」。此二情況，上文已論及，茲不贅。

很明顯，清季文士對牧齋書籍日見稀罕及其流失於海外感到莫大惋惜、擔憂。如何使牧齋之書籍再廣爲流通，已成爲一個迫切的時代使命（及市場需求）。

此番出版大業，因緣際會，文星聚於江蘇吳江，其人氏功莫大焉。先是薛氏從書賈手中收得舊鈔本《投筆集》（此爲無註本，與上述鄧氏所刊印有錢曾註者

⁹⁷ 同前註，頁 975。

⁹⁸ 固然，筆者此語，乃側重於上文所述牧齋著作於晚清出版時附錄之序跋、凡例等文字而言。實則如本文審查人指出，清末讀者因非議牧齋其人之操守而鄙視其著作者亦大有人在（至今猶然）。審查人特別指出，晚清周星譽（1826-1884）因牧齋編纂《列朝詩集》不書「順治」年號，斥之爲「殘明遺孽」、「自附於孤臣逸老，想望中興，以表其故國舊君之思，真無恥之尤者也」。稍後之劉聲木（1876-1959）也對牧齋不以爲然，云：「其晚年皈依佛家，亦自知大節已虧，欲藉此以湔釋恥辱，此所謂欲蓋彌彰，懺悔何益？」清初以降，類此之批評，實不絕如縷。劉聲木與章太炎、鄧實生存的時代相去不遠，可見其時存有其他閱讀聲音，並非所有讀者都視牧齋爲一典範性大家。周星譽及劉聲木之說俱見〔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菴楚齋四筆》，《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卷 2，頁 717，「論錢謙益」條。

不同）、《有學集補遺》（清初何焯舊藏，尤可珍貴），其里中同好爭相傳閱，羨歎不已。嗣而有里中藏書家范氏，胸襟大方，以父祖輩珍藏之錢曾詩注原槧本、《初學》、《有學集》等示薛氏，與之把玩交流，並謂今二人之藏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合則兩美。里中之好事者遂慫恿印行，范氏慨然允諾（實則書之得以印行，范氏貢獻最鉅），薛氏則自任編纂校讎之勞。

因緣、條件成熟，《牧齋全集》排印本乃於數月後誕生。此中之因緣始末，眞清末藏書、印書的一樁美好事，書林佳話。

乾隆禁燬牧齋之後一四一年，牧齋書再化身千萬。

翌年，清亡。

薛鳳昌遂漢齋《牧齋全集》後爲錢仲聯先生編校、出版《錢牧齋全集》之重要底本。

十一、結語

本文通過牧齋歿後出現的悼文、傳記，以及歷次刊行牧齋遺作的序跋文字，整理牧齋通往「典律化」的路徑，期有助於讀者比較完整地瞭解牧齋今傳之書的來龍去脈，亦藉之以反映清初至清末，讀牧齋詩文者的反應、心態及其所處時代的歷史脈動與「精神」。

明清詩文相對較短的「接受」歷程，造成文學史認識論上的不足。近世學者，固不無標舉「正典」，區分流別的嘗試，但其論述，卻每每對研究對象的當代語境不夠重視，有汨濫無歸，率爾操觚之弊。職是之故，本文不殫繁瑣，逐一列舉龔鼎孳、歸莊、鄒式金、凌鳳翔、沈德潛、乾隆、章炳麟、朱天民、鄧實、張繼良、沈曾植、薛鳳昌等對牧齋人品、性格、文學、仕履之議論，盡量展開「脈絡化」的工作，用以突顯上述讀者、出版商如何各因師友關係、閱讀品味、流傳需要、意識形態，對牧齋的遺著有不同的處理，以期重構牧齋其人、其文學評價之曲折歷程。質言之，本文之所作，無非研究牧齋的、必須而基礎的工作，希望能對以後之牧齋研究，提供若干方便，本文論述失誤之處，必定存在，尙祈大雅方家指正爲幸。

至於本文述論所援用之原始文獻，多爲牧齋研究者經常徵引者，無甚新奇，野人獻曝之譏，所不辭也；然而，因其慣見，亦往往被輕易過眼，論者或未能充分挖掘內裏可供論述之重要資訊。例如，本文論章炳麟一節，論者持章氏之言

「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用謂此乃章氏於牧齋之怨辭，卻未能揭示章氏在「攘斥滿洲」思想脈絡中提出此論的時代意義，也就未能細察在牧齋「接受史」中，發生於秋毫之末的種種變化。本文論述龔、歸、鄒氏對牧齋之評論，乃至於乾隆所加之斧鉞之誅，莫不在習見材料中展開，但力避想當然耳，嘗試揭開文字襞績處塵封已久的文理義理，披露作者的思考與心事。

復次，本文自章氏《卮書》一節以下，乃為補進當代研究視域前錢氏「接受史」之末端而作，敘述清末以來搶救、出版牧齋的情況，亦以之見出錢氏遺著歷二百五十年後，仍具市場影響力。同時，其時之出版工作，亦為當今之錢謙益生平、詩文研究奠下基石，陳寅恪、錢仲聯諸先生莫不得力於此。此中種種，前行研究者尚未留意及之，是故筆者努力蒐羅，彌縫罅漏，或為後之研究牧齋者之一助乎？

錢謙益遺著於清代的出版及 「典律化」歷程

嚴志雄

十七世紀明清之際，錢謙益(1582-1664)乃「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壇宗主，此學者無異詞，但錢氏以南明弘光朝禮部尚書之身降清仕清，淪為「貳臣」，當時後世，不恥其為人，亦是情理中事矣。有謂「大節有虧，其餘皆不足觀」，錢氏歿後，欲為錢氏謀一身後名，或欲保存、刊刻、流通其「文學遺產」於世，主其事者，必須向讀者解釋，錢謙益其人既大節有損，為何還有必要閱讀其作品，以及提點讀者，該如何比較正確地理解錢謙益。筆者發現，在錢氏歿後出現的悼文、傳記，以及歷次刊行錢氏遺作的序跋文字中，漸次形成一條錢氏通往「典律化」的路徑。本文對錢謙益遺著在清代的「典律化」歷程作一整體、系統性的考述，以觀察、理解錢謙益由明末清初走向後世的、「典律化」的曲折歷程，以及其「接受史」。

關鍵詞：錢謙益 清朝 出版 典律化歷程 接受史

Processes of Public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Qian Qianyi in Qing Times

Lawrence C. H. YIM

Qian Qianyi (Muzhai, 1582-1664)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gifted writers of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Qian was, however, disdained by many in the public as a political opportunist who turned his allegiance to the conquering Qing as the Ming dynasty crumbled. In a culture which prized morality and integrity, Qian's path to glory was difficult and thorny. When posthumous editions of Qian'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or partially published works appeared, the people who helped compile and publish these works always had to explain why it was worth publishing the works of a reportedly morally controversial person, and explain to the readership how Qian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reminiscenc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successiv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his posthumous books of varying dates, there emerges a collective discourse on Qian that led to his eventual cano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This paper gives a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labori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es involved in publishing and canonizing Qian, spanning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Keywords: Qian Qianyi Qing dynasty publication history canonization
reception history

徵引書目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 王紅薈：《錢謙益藏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白亞仁(Allan Barr)：〈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清史論叢》2010年號，頁49-85。
- 朱天民：〈錢蒙叟歷朝詩集序·按語〉，《國粹學報》第45期（1908年9月），撰錄頁1b-2a。
-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 杜甫著，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
- 沈津：《書叢老蠹魚》，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沈德潛編：《沈歸愚自訂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_____選編，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 周法高：〈錢牧齋詩文集考〉，《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
- 卿朝暉：〈錢曾《牧齋初學集詩注》再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1期（總第84期），頁97-103。
- 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徐陵著，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張小李：〈乾隆帝批判錢謙益的過程、動因及影響〉，《故宮學刊》2013年第1期，頁150-163。
- 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初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_____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初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疍書（初刻本）（重訂本）》，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 _____著，徐復注：《疍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郭璞注，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陸林：《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 楊雄著，汪榮寶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05年9月，頁71-78。
-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南雷詩曆》，《黃梨洲詩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
- 裴世俊：《錢謙益古文首探》，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遜審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蔡營源：《錢謙益之生平與著述》，苗栗：作者自印，1977年。
- 鄧小軍：《古詩考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鄧實：〈國學保存會藏書志〉，《國粹學報》第49期，1909年1月，藏書志頁1a-b。
- ：〈國學保存會藏書志〉，《國粹學報》第54期，1909年6月，藏書志頁1a。
- ：〈國學保存會藏書志〉，《國粹學報》第65期，1910年4月，藏書志頁2b-3a。
- ：〈紹介遺書·舊著新刊類〉，《國粹學報》第45期，1908年9月，紹介遺書頁2b-3a。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卿朝暉輯校：《牧齋初學集詩注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嚴志雄：〈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明清詩文研究》第1輯，2011年6月，頁1-28。
-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 Abrams, M. H. & Geoffrey Galt Harpham, ed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Eleventh Edition). Stamford, CT: Cengage Learning, 2015.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 Chang, Kang-i Sun. "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s. Wilt L. Idema,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Yim, Lawrence C. H.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